

也就不能夠組織強有力的政權；所以他在歐洲大陸的列強中間，並不生什麼嚴重的作用。因此德國沒有參加十九世紀列強分割世界的殖民政策。到後來在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列強爭着開闢中國市場的時候，德國也絲毫沒有什麼表現。在這個時候德國只是在開始發展他的工業資本主義和開始在世界的舞台上發生政治作用。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時候，德國正移他的全力在國內作統一的戰爭。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國內的統一，因此遠東的事件，德國更無暇顧及。到後來，法國人英國人強迫着開闢了中國口岸的時候，於是德國人也派遣了他的艦隊（這些船隻實際上都是很舊而無戰鬥力的）到中國要求通商的權利，這些權利結果都被承認。爲指出德國在中國利益的薄弱，僅僅指出下面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瞭：有名的地理學家利浩得芬（著有中國地理五卷，這個著作就是在現在也是中國一種特出的著作品）在中國居留很多年，他在中國研究的費用，不是德國政府來供給，而是上海的商會來供給，並且一部分的經費是從英國人手中取得。由此便看出當時德國對中國是怎樣的淡薄。

在十九世紀過程中德國達到統一了。至於他統一所經過的過程，這在西方革命史的範圍，我們僅僅只好回憶到

這個主要的時期。1894年德國組織了關稅的聯合，這個時候以前德國的分散狀況不僅僅是政治上而同時在經濟上也是不統一的，各個諸侯自己都徵收特別的租稅。我們知道外國資本家對中國的厘金是怎樣的喊叫，在一八三四年以前德國也有厘金的存在。他同中國的區別，就是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大陸而德國則是比較小的一個國家。一個人從這個王國經過三小時的路程就須繳納關稅。但是十九世紀初期十年內英國的工業革命普遍了全歐的時候，在德國也開始了經濟統一的運動。德國的資產階級為得着一個整個的市場開始反對德國的厘金制度，德國各城市——漢堡 不列莫納的商人願意無阻礙的在德國境內售賣他們的貨物，同時在政治上也企圖組成一個階級。

一八三四年稅關聯合的組成是德國完成統一的第一步。又經過數十年後這個統一才用兩次戰爭把他完成了——第一次，在一八八六年同奧大利的戰爭；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同法蘭西戰爭。

為什麼用戰爭方法呢？——為深切的明瞭現在中國的事件起見，這很值得我們來研究。

在一八八六年普魯士和奧大利發生戰爭，普魯士是德國最強的一個王國，奧大利是由匈牙利，斯拉夫，和德國

三部分組成的。普魯士的國王是高哥滋洛林；奧大利的國王是岡伯蘇里基，這兩個國王的太戰爭，好像現在許多人所想像如同張作霖和吳佩孚的鬥爭，僅僅是兩個好戰的督軍的戰爭一樣。但是這次戰爭不能夠用民族的動因來解釋。在戰爭中間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幫助高哥滋洛林。岡伯蘇里基也有奧大利資產階級的幫助。這兩個國家的鬥爭怎樣解釋呢？這個原因很簡單。在一八四八年德國的人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企圖從下層來解放和統一國家，逐出所有的五十個國王和諸侯，但是這次革命失敗了，人民從下層沒有能把國家統一了。因此要完成統一必須用其他任何的一種方式來完成；或者是國王中間的最有力者征服其他的國王來把國家統一起來。沒有那一個民族在歷史上只用煽動和宣傳得到了民族的統一的，無時不是經過很大的震動，不是革命手段，就是用反革命手段才能夠走上統一的道路，那一種方法得著了勝利，關係於將來發展的方向，但是無論這第一個方法或是第二個方法都是要用武器才能勝利的。

若是中國的革命不能夠從下層用革命方法，來統一中國，假若是農民，工人，勞働的智識分子不能夠武裝的驅逐中國的督軍，那末中國將來必然要發生許多戰爭。在這



些戰爭中間最強有力的督軍將要把中國統一。假若勞働階級不能夠完成他這個任務，那末就會使資產階級有盡量剝削工人農民新的可能。

在一八八六年普魯士的國王戰勝了奧大利，從德意志聯邦國內永遠的排斥了奧大利。普魯士國王如能把德國統一，不惜拿德國一部分的人民作犧牲。

一八七一年的戰爭主要的動因是什麼呢？這裏使我們又可得着很重要的教訓：當德國內部割據成許多部分的時候，他在國際上並沒有發生獨立的作用。十七世紀的戰爭差不多都是在德國的領土。在遠東我們知道當日俄戰爭的時候，戰爭的發生是在中國的領土——滿洲。因為中國的衰弱，所以不敢反抗，在歐洲，當時德國也陷入了這種狀態。但是德國統一後，國際的情勢也隨之變更了，——以前分割成許多部分，現在却變成爲整個的強大的列強，當時統治中歐的法國，看見這種情形，就發生了嫉妬企圖阻止他的發展使他陷入於永遠分割不振的狀態。因此已經統一了的德國，必須把武器來給法國證明他自己的力量，自己成爲獨立強固的權利。假若中國得着了統一，中國也必須用武力來證明自己實際上是統一的國家，就是中國統一的過程還需要很劇烈的戰爭來反對歐洲的列強。這個戰爭

現在已經很明顯的開始了。我們知道孫傳芳和吳佩孚作戰的費用大半是英國的供給。他們實際上就是代表英國的軍隊用武力干涉中國的統一。研究德國的歷史，使我們明瞭現在中國狀況中我們所不明瞭的事實。當我們讀了中國一個經濟學者的一篇文章時（在中國用英文載在 Roben 書上的）我很高興因為他很知道拿中國同德國來比較……

一八七一年德國戰勝了法國以後，德國，代表四千萬人民整個的經濟組織的大強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成為世界市場上政治上主要的角色。但自從一八七〇年一直到一八九四年，德國還沒有干涉中國的事件。普法戰爭以後，德國正在發展自己的經濟，此後才成為歐洲的第一個工業的強國。在德國的經濟發展中間，從普法戰爭到九十年代以前發展的速度，遠不及九十年代開始發展的速度。一八九三年至九四年九五年德國的經濟發生了劇烈的轉變，此後才開始了德國近代工業凱旋的隊伍。

德國在經濟發展中必須戰勝許多的困難，若是拿英國的發展同德國來比較，那麼就可以看出兩國的發展有很大的分別。英國是個島國，他有海洋阻隔陸路勢力的侵略，只是有艦隊的國家才可以同英國爭鬥。因此我們看到英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英國只是開始其他國家戰爭，而其

他國家不能同英國戰鬥。

德國的地理上的情形使他永遠感到危險——一方面是法蘭西，一方面是沙皇俄國。法國是集中的有力的大強國。俄國像中國一樣，有廣大的幅員多量的人民和天然的富源，德國即存在於這兩個強國的中間。在戰略上存在於萊因河和唯史河的中間。

俄國能夠忍受許多的失敗，因為他有許多地方可以退守，如中國一樣。當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的中間，因為戰爭的時候，雖然有反革命從各方面的進攻，但是他們能盡量的退守。當一九一八年國內戰爭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地圖上看見蘇維埃俄羅斯而從這方面退却時而退却到中部領土，雖然有暫時的縮小，但是到後來又從新擴張，這是戰略上永遠的優點。中國也同時具有這個優點。在中國現在的國內戰爭中間，這個優點表現在革命軍方面。這使革命軍雖然暫時受了任何的損失，但終究可以候機待時再謀發展。廣東的軍隊不用馬匹不經鐵路步行一千四百里。這種驚奇的行軍自然這很消磨軍力。就是現在長江的戰爭，廣東打了敗仗，這也並不能說革命軍已打了敗仗，因為他經過相當休息之後再向前進。地理上的條件可以使中國革命可以很敏銳的進展。

這樣，俄國也就能夠進展。這個優點不僅是紅軍對白

軍，而也是沙皇的軍隊對德國的軍隊。德國是一片不大的領土，一個失敗使他永遠可以滅亡，德國分割了二百年直到七十年代，這個分割的狀態才告完結。這個時候德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懸念，就是不同時反對法蘭西和俄國，牽入戰爭，因為這能夠使德國勢趨滅亡。

但是德國除了戰勝政治上的困難以外，還須戰勝許多經濟上的障礙。拿英國來看，就可以看出英國主要的經濟中，在沒有鐵路以前就有互相的聯絡：從倫敦到利物浦，不列斯文，燒爛的各處都可以沿海上航行，而海上的運輸是最便宜的。德國沒有這個優點為聯絡國內各部分成為整個的，必須建築很多的鐵路，為使工業發展，必須投巨量的資本於運輸的事業。

其次——英國到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中間，不斷的資本的積累，他剝奪了半個世界，他利用他的巨量的資本，很快的發展成為經濟的宗主國。而德國只是才開始資本的集聚發展他的工業。若是我們要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小說，那麼我們到處都可以看見：德國的工程師手裏拿着帽子到英國的工場謙下的請求一個位置，在那裏可以學習可以得到工資，因為他自己的家鄉不能夠尋得着僱主。

自然，英國不得不輸入農村經濟的生產品，但是就在這

一點上德國也沒有佔着優勢。德國的土地有很多的砂子和很多的高原，假若德國不用技術和科學的力量提高農業，他的土地還不夠養一半的人民。中國有很肥沃的土地，歐洲人很高興這個故事，就是說中國農人剃了頭的頭髮，據法國的一個著作家的傳說就拿到田地種作肥料，或是當客來了的時候，加以很好的款待，若是不將所吃的排泄了以後是不放走的。雖然中國的農民這樣努力的耕作爲改善他的土地的收穫，但是他們的收穫，還不能同德國比較，他們的區別就是中國的農民用他們的血汗來耕種土地，而德國的資產階級則用技術的工具來發展他的農業。

爲引起我們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興趣，我們稍爲講一講這個問題。德國爲發展自己的農業，發生了人造肥料的問題。這種肥料從什麼地方得來呢？德國的化學發明了新的所謂『肥料的科學』，德國第一次採用的製造肥料，德國人首先利用製鋼的餘物——磷酸鹽，採用某淡氣的物體，在大戰時不能從南美洲（智利）運肥料的時候，德國人就發明了植物從空氣中取得淡氣的方法。

牲畜養育業在德國也佔很重要的地位，德國人很注意研究怎樣養家畜怎樣能把豬養得肥，怎樣從牛身上得着更多的牛奶，以及其他等等。這些學識在英國以前就很發



達，但是德國人使這些學識得着了更進步的發展，他們極力的發展這種學識，以其所有的東西來製造，甘蔗可以製糖，但甘蔗產於埃及和美洲而德國不產生甘蔗，於是德國就想出用糖蘿蔔製糖的方法，這都是德國化學家和德國的學者的成績和功勞。

這些結果是什麼呢？可以用下列的數目字來表示：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一〇年德國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五穀的收成在這期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從18,000,000噸增到25,000,000噸，但這並不是因為擴大了耕種的土地，而是因為農業上方法的改良。山芋的出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就用蘿蔔製糖業來看，在一八七〇年取得一個基羅格蘭姆的糖，須用11.5基羅格蘭姆的糖蘿蔔，但在年後一個基羅格蘭姆的糖只用六個基羅格蘭姆的糖蘿蔔，這就是說取得同樣數量的糖，糖蘿蔔的需要減少了一倍

德國發展自己的農業後，第一便減少了從外國輸入的麵包，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第二使農民成為自己工業品的廣大市場，這樣就造成了工業積極發展的條件。德國在戰前出口的貨物達10,000,000,000馬克——約合5,000,000,000盧布。這樣大的數目還只是德國國內市場消費總生產的一小部分。德國的工業家在技術上在戰前就開始勝過其

他的國家。我們且不講外交史，（因為這就要太偏重於外交史）我們只拿戰前最後十年的經濟狀況來看，就得出一個很驚人的現象，就是德國各部門一年接一年的戰勝英國的各產業部門，譬如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的中間，德國鋼鐵工業發展的速度超過英國七倍。

在以前鋼鐵的生產遠不及英國的德國，到一八九三年德國就發展到英國所站的水平線，後來，德國不僅鋼的生產同時鐵的生產也超過了英國。大戰前，德國的鋼鐵生產化學工業和電氣技術工業都在英國之上，英國之參加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就是因為德國除了紡織工業和煤產工業外，都超過了英國，這種發展都是由於技術的完成得到的。例如：在七十年代在英國工程師俾斯麥克發明了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鑄解鋼的時間可以從一點半鐘減少二十分鐘，這使英國佔了很大的優勢。在英國有不含磷酸鹽的純鐵礦，而俾斯麥克所發明的方法也正是應用在純鐵礦的鋼鐵生產。但是德國沒有不含磷酸鹽的鐵礦，這種狀況之下無異宣佈德國鋼鐵工業的死刑。但是在一八七六年英國工程師東馬斯完成了俾斯麥克的發明而又發明出含磷酸鹽的鍊鋼的方法，他這個新的發明，在英國沒有能夠實用，而德國人利用了這個方法並且能從最劣等的鑛鍛鍊鋼鐵。

在各生產部門都是這樣，英國在技術上比較德國很是落後，在一九〇三年洛特史託在他根據英國學者大會的議論所寫的文章裏面，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工人教育工程師是怎樣的落後。德國資產階級用他發達的技術戰勝了英國人，尤其是他的教育事業更勝於英國。德國的資產階級知道若是想戰勝英國，必須從工人身上得着更大的利潤。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有像德國那樣多以及建設的那樣好的學校，雖然德國的資產階級也憎惡工人階級，但是他知道若是想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必須改良工人的生活條件，所以德國最先施行了對工人疾病和殘廢的解除，自然這不是出於資產階級的自願，而僅是對工人進攻的讓步，但是這種對工人的讓步，對資產階級自己也是有利益的。

所有的這些效果，只是在最後十九世紀才完全表現出來。一八九三年——九四年和九五年，是德國經濟積極發展的時代，這個時候，全世界都曉得德國是個強國，而且將走到帝國主義的侵略道路上來。九十五年以前，因為經濟的衰落，德國還沒有感覺到自己在世界的市場上是個勝利者，因此德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想到殖民地政策，他的主要的懸念，還是和從前一樣，使俄國的沙皇勿與法蘭西共和國聯合，為使這樣俄國的沙皇和法國不能同時消滅了

德國。俄國的外交總長舒萬洛夫說德國的政治首領俾斯麥就是在睡夢中常常夢到俄法的聯合：他夢見沙皇的俄國和法國共同來室殺他。在德國初戰勝法國後的政策都是來設法防禦將來的聯合。在一八七九年德國和奧大利訂結了同盟，其後把意大利拉入到這個裏面，為預備將來同俄國和法國戰爭。懼怕俄法的聯合同資本主義發展的幼稚是德國走上殖民地政策遲晚的原因。德國在一八八四年國內統一後十四年才開始作這第一步。但是德國能夠取得些什麼呢？所有的殖民地都已經被分配了，而德國所能得着的只是些殘餘的地方。好像餓狗尋骨頭一樣，看那裏有吃了肉剩下的骨頭，德國也遍尋全世界為取得那些法國英國俄國還沒有拿到的地方，若是在地圖上看德國的殖民地，就很明顯的看出德國尋得了些怎樣的骨頭，在起初他搜到了尚沒有佔據的非洲的一部分。這些地方都是互相沒有聯接，各地都需要蓄養特別的軍隊，而并且沒有那一個地方是能夠供養大批軍隊和建築鐵路，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是原料也不多。所有的這些地方既沒有戰略上的作用，又沒有經濟上的意義。

後來他又開始在印度洋太平洋得到了些小的島嶼，這些島嶼戰略上的作用都很薄弱，雖然所佔據的這些地方，

並沒有一般的在經濟上的作用，而德國佔據了這些地方他覺得帝國主義發展的新時期已經開始。法國在七一年的戰爭以後，開始在非洲擴張自己的領土佔據了安南，而同時英國也擴充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了，俄國也向西伯利亞發展，德國的資產階級也深切的感到自己要取得些地方。但是那裏去呢？關於這一點他曉得了中國方被日本打敗了，他很明白在東方已經開始不只是能取得一小部分，而是分裂一個龐大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面可以干涉。這是德國殖民地主人的希望的第一步閃光。

德國的參加此次遠東事件，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俄國應當是瓜分中國的發動人，但這個發動被日本奪去，俄國應當向日本說道：『站住！不要再進！』但這個不能是俄國一國能作，所有的列強都用外交的手段企圖聯合其他的國家作外交上的援助。各個列強都避免孤立，不使自己孤立是各種政策中間最重要的任務。在任何將來的鬥爭中間應當時時記憶着敵人的聯合是最不利的，應當設法在敵人中間破壞他們的聯合。因此，俄國也就從英的國家竟得了援助。

誰能夠幫助他呢？法國已經是滿足了：他已經有了安南，而他并不急於在遠東同俄國合作。他所以與法國的會

作僅僅是因爲俄國是他的同盟國。在七一年戰敗了的法國要與俄國聯盟主要的還是在反對德國而同時在其他的場合兩國也能互相幫助。俄國之所以訂立這個同盟，是因爲俄國的沙皇需要金錢的幫助。俄國爲亞細亞洲與英國爭鬥，因此他不能從英國得着金錢的幫助，法國是當時最大的銀行主人而俄國就向他借債，這些債款不僅是用貨幣來償還而同時用俄國農民的赤血。爲保障完滿的成功，當沙皇反對時，若僅僅同法國聯盟還是不夠，而俄國的政府也轉向其他的請求幫助。德國的外交急忙着允許了幫助俄國。他覺得在遠東同俄國合作的不僅是法國，而同時也有德國，那麼爲反對德國的法俄聯盟將要失其作用，他同他的仇敵在遠東的聯合，德國的資產階級爲要緩和同他的敵人在歐洲的衝突。這樣看來德國資產階級干涉遠東的事件含有二種目的：第一，從日本口裏奪出一塊來；第二，造成在遠東的聯合，這個聯合可以緩和在歐洲的紛爭，德國這個政策對法國的意思是這樣：法國先生便願意同我們爭鬥，爲着我們佔了你們的阿爾薩斯羅蘭爲什麼要這塊土地我們互相爭鬥呢？我們同到中國去，那裏的土地比我們在歐洲互相爭奪的大的多，那裏是廣大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得很大的一部分。

列強的干涉——法國，德國，俄國的公使有一天向日本提出通牒。在通牒裏面說，他們不允許日本佔據遼東半島，因為這是表示日本將要統治北京，德國并且表示準備用武力來阻止日本這種行動。

因為有三大列強的反對，日本只得放棄了旅順和遼東半島，英國對此取旁觀的態度，因為他想到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抗，因此他還沒有決定同日本聯盟。這個聯盟，後來在一九〇二年是締結了；但是在一切政策上不能立刻一齊決定。在世界列強中日本還是幼稚，英國那時還沒有想到日本事實上能成爲怎樣重要的列強。因此法國德國和俄國的締約就夠從日本手裏奪回了一部分。

但是，中國現在却明白了這些從日本手裏救他的國家也漸對於他發生很大的危險了，他們提出最苛酷的要求，在下面我們對這個危險所表現的形式再加重述。

我們已說了很多關於德國英國和俄國的政策，當我們看到這些國家對外政策在中國發展所得結果的時候，我們以前所消耗了的時間算已經贖回來了。我們在以下再說到列強在中國佔領租界的鬥爭，這種鬥爭就在馬關條約後接着開始了。

## 九

隨中日戰爭之後，實際上將中國開放為外資市場的列強爭奪租界的爭鬥。

我們知道，在中日會議及馬關條約的原則上規定中國必須賠款二萬三千萬元。依當日的市價，約值十萬萬馬克，五萬萬盧布。這樣大的數目中國政府自然難得從國內市場上取得到手。因此便發生借外債的問題。當中日開始談判的時候，在一個俄國財政界的機關報——貿易雜誌上便這樣的提出下面的話：借債給中國的列強，必須得到統治中國之權。

沙俄便是準備借債與中國的列強之一。不過當時沙俄還要向法國借債，以為建築鐵道，編練軍隊之用，自然不能從自己的錢袋中找得分文，以財化中國。法國資產階級拿出了一大筆款來，但是沒有給中國，而給俄國政府了。這便是沙俄政府財化遠東的政策。法俄銀行團與沙皇政府為收納款項之事，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訂立了條約，中國政府便在這個條約末尾簽字了。根據條約上規定，中國收到四萬萬法郎，利息率為4%，但得沙俄政府為担保。沙俄政府負責向中國收納該項借款利息的任務；因此沙



俄政府便成爲中國的保護者了。英國已經由自己的經驗之中知道借款的意義；因爲英國從埃及得到這樣的一種方法，使埃及國王借英債很久，尙不知自己已被英人裝在他的衣袋中了。英國明瞭沙俄政府這種政策沒有其他的作用，只是想由中國北部侵入中國，更進一步便要佔據侵入之地罷了。因此，英國外交用盡各種方法來阻止締結這個借債條約。英國公使恩康諾爾顯然的便恐嚇中國北京外交部。英人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提出德國來擔負借款的責任。英國的這樣提議是想在他的世界政策之中造成良友與仇敵。我們知道德人剛剛同俄，法攜手強迫日本退出遼東半島，而現在驟然轉過臉來反對沙俄，是爲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當法，俄與德國共同扼住日本的咽喉之後，俄國只同法國聯合便可以伸手入中國，已經不需德國了，因此把德國從前進的行動中拋棄了。德人爲報復俄，法恐弄他的仇恨，便提出自己借款與中國，中國（在英國公使恐嚇外交部以後）同意於德人的提議；但是必定使英國的金融市場不參預借債問題纔可。

德國歷史家傅倫克在此時寫了這篇關於遠東情形的文章，他提出很有趣味的事實：柏林政府只願德國銀行單獨經理對中國借債事務，但英國銀行不願德人獨握此權；因

此兩國銀行家相約齊聚一處，商酌妥協辦法。傅倫克不爲不平，他說，德國銀行的倫敦朋友對於德銀行借債給中國的觀點與意見還要比柏林政府的意見更有意義些。

雖然經過了各種波折，雖然中國政府顯明的知道，若向俄國借債，等於替沙皇直接開闢一條直通中國心房的大道，將必有致死的危險；但是中國終竟借了俄國的從法國錢袋裏拿出來的這款項。

在一八九六年沙皇尼古拉第二行加冕禮，中國政府派李鴻章去俄致賀，寄寓於一大茶商波爾洛夫之家。我們知道，俄國在很久以前已經與中國發生茶業貿易的關係，自然這個茶商在沙俄對東方政策上必定是很有勢力的人，李鴻章之寄寓其家，不無沙俄政策內幕之意義。能讀俄文的人，能參考維特伯爵日知錄，這本書對於當時他們怎樣包圍李鴻章的情形，描寫盡緻。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知道，當時他們不惟用許多心機，並且用填塞錢袋的方法去誘惑李鴻章。沙皇對遠東前進的全部政策全繫於收買李鴻章之上。在那時中俄政府已經開始談判關於建築中東路穿過滿洲前往海參崴及建築繞滿洲之邊界的一條鐵路的問題。根據談判的結果，組織一華俄銀行，以爲建築中國鐵路於滿洲的費用。當時雖然高倡所造之路是中國的鐵路；但是當

時在中國的一個英國報紙把在外交史上所爲卡倫 (Cassel) 會議的祕密條件公佈出來了；由此條約很明顯的可見沙俄想侵佔滿洲的野心。這個條約的內容；第一，將一切管理鐵路的權限一概交于俄人之手，所謂鐵路公司中國督辦不過是中國政府與鐵路聯繫之偶像；第二，在鐵路兩側必須留出一條寬度的地帶，以供鐵路——實際上是供沙俄政府剝削其財富，土地，森林；所以在名義上是爲鐵路，在實際上是開闢一條寬廣的租界；第三，沙俄政府有派兵保護該鐵路之權。

以上都盡是1896年的事。

同時德國他開始來干預遠東的事，她企圖單獨的侵掠中國。

還在德國與俄國取同一行動，企圖把馬關條約這塊肥肉從日本嘴裏奪出來的時候，德皇威廉第二寫了許多信給沙皇，談及遠東問題。沙皇與威廉第二相互往來之祕密函件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德國革命之中概被搜出；爲明瞭他們怎樣的政策對付中國，所以我們有知道這些祕密文件內容的必要。

這些函件之中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十分注意的，特別是當德國在外交上自稱保護中國，爲民衆之友的時候，我們

看德皇向沙皇寫些什麼，他又想些什麼。但我們這裏不要以爲德皇想些什麼或沒想到什麼，並沒有什麼重要，倘若再經過15—20年美國革命成功以後，把現在一味誇示爲中國民衆之友的美國政府的領袖們現在和以前互相往來的一切祕密文件公佈出來之後，將他們相互間沒有證人的對中國侵掠之企圖，排起一幅詳明的圖畫來看，那時我們或能領會這些祕密文件的意義。我們知道，研究祕密函件的政治意義在於使我們不至於爲和藹的，天花亂墜的花言巧語所欺騙，而能看透隱藏在這些花樣的背後究竟是什麼。

1895年四月26號威廉寫給沙皇的信之內容如下：

『我堅決的在我的權力所及的範圍之內保持歐洲的和平，以作貴國後防的屏障，使無擾亂貴國經營遠東的事業。顯然的，貴國將來的偉大任務在於照料亞洲，防禦黃禍，以保障歐洲。在貴國將來在這種偉大工作之中，你可以見到我是常常的站在你的方面，竭盡筋力的準備着幫助你的。』(附註)

(附註)：見佛蘭克(O. Franka)所著之『1894年至1914年泰東列強。』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 bis 1914第117頁1923年出版。

據威廉的意思，沙皇當日的責任在於防禦黃禍，以保

障歐洲的文明。其實我們早已知道沙皇之經營遠東並不是爲防禦黃禍，恐其加害於歐洲，而對於準備在遠東給英國以嚴厲之打擊。這種打擊對於德意志帝國主義要比對於尼古拉第二政府還有利益些。

威廉既向沙皇說，他要幫助沙皇防禦黃禍，以保障歐洲，連結着便要求給他以任何的報酬。因此，大工業民族的德國的皇帝在給沙皇的同一信（上面的信）內說：『我希望你站在友誼的關係上替我尋找任何與你無妨礙的海港灣，使德國也能同樣的得需些微澤惠。』

一個所謂歐洲文明的保障者對另外一個說：你往東方去，防禦黃禍，以保障文化；但是你若從此中取得任何東西，請你分給我任何港灣，只要不妨礙你，對你方便。這便是德俄兩皇帝間所玩的把戲。

此後威廉曾在1897年到彼得格勒之彼得皇宮一行，被沙皇邀請與沙皇同車前往閱兵。在他們的車上談話之中，威廉曾問過：假使德國佔據膠洲灣，於俄國是否有礙。沙皇當時未曾答覆。嗣後，德宰相與沙皇在彼得格勒重新談判，在德相補充沙皇的言語中，也曾提及德國是否可以佔據膠洲灣的問題。沙皇政府對此問題在實際上仍始終無所答覆；因爲當時沙皇政府對於他自己是否佔據此港灣的問

題，尙無成見。在標題爲克遜條約的一篇論文上便顯明的提議不獨要佔據遼東半島，並須佔據膠洲灣。俄國的態度既已顯明，德國自然再不向俄國商酌，而要自去動作了。於此，德國公使重新得着命令，使他與中國政府開始談判關於德國幫助中國反對日本，中國政府應報酬德國以港灣的問題。德國公使對此問題曾再三迴慮，覺其至爲繁難；因爲他不能直率的向中國政府說：眼見他人快要斫下你的頭，把你割成細片，將你所有的一切掠奪內空；你不如乘早乖得點將你的腿割一支給我好了。

當時中國政府的要人亨利親王很乖的也很堅決的答覆德國公使，請他以後對此問題再作談判。

我們知道意外之事往往對於政策有莫大之幫助。恰巧此時發生了一件奇事，在山東（膠洲灣卽在此省疆域之內）有兩個德教士被害，自然德國政府立即便要求替德教士報仇，牠要求不僅只將殺害「神父」的兇手處以死刑——兇手是誰當時還不得而知——，並脅迫中國將膠洲灣租借99年。從法國的文書之中，我們可知道，德國軍務部的代表早已在兩年以前將膠洲灣各面完全測量過了。他們當時還有些躊躇不決——他們是否要佔據廈門；不過此地離英國的勢力範圍——長江很近，他們又怕英國或將掣他的

肘。因此在殉道的教士被害的兩年前，在德國軍事司令部之內，已經決定要佔據膠洲灣。開始他們想只能用談判的方法取得此地；但是他們無論如何必要取得膠洲灣。受上帝使命所驅使的教士們彷彿已經知道，為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起見，他們死在山東比死在其他任何省都好些。德國蒙教士之福在一八九八年便佔據了膠洲灣。

我想，假使將來曝露出來更多的密碼文件，我們對此事將有更清白的了解。直到現在我們只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秘書；不久以前雖在德國又發見許多文件，也是關於此有趣的時代的事；但可惜皆屬官樣文件，自然在官樣文件之外，還有其他秘密文件，假若將這些秘密文件公佈出來，或者不難證明，殺德國教士的中國人原來曾受德人的賄賂。

因此，俄國之侵佔滿洲，為在中日間和平條約變遷之後的第一派的侵略。德國之佔據山東，除得膠洲灣之外，並且租界條約之中得到建築鐵路，開採礦山等權，這便是第二派的侵略。

同時，所謂中國之第三個救星——法國也開始作第三派的侵略。法國在安南之東京方面與中國相鄰。於是，第一，法國將舊界稍加變更；第二，在由安南到雲南府的鐵

路附近得到租界。此外：牠並在雲南省佔有很多的租界，以爲其侵略之中心。法國吞併雲南的政策在於前從四川，佔據揚子江上游，使西部中國與牠的海防港灣連合起來，在東京交換一切貨物，法國藉外交手腕之脅迫，終能達其所望。當時顯明的俄國已不容『株待』了。德國佔據了膠洲灣，法國亦得其償，滿洲北部自然是給俄國的，俄國便立即開始了爲建築中東路及由哈爾濱而南而直到剛從日本手中奪去的旅順口的路綫，而作最後的爭鬥了。

旅順口本爲中國的海港，中東路亦爲中國的鐵路。俄皇爲實際將此海港與鐵路歸爲已有，必須具有兩個條件：1，使中國向俄國借築路之款；2，割讓旅順口爲俄國之租借地。英國則堅決的反對此兩種企圖；中國的大官僚也有深沉的戒見。但雖有英人與中國官僚之反對，俄國公使的副官葩夫洛夫終於戰勝了他們。

俄國用什麼方法得以取勝呢？我們可以從登在『紅皮文書』——係蘇聯文書部的機關報——第二卷上的沙皇外交大臣文件中，便得見他們的方法。這些材料對我們都覺很有興趣的。

我現在把其中幾章文件引徵如下：

第一，一八九八年正月八——二十號沙皇廷臣蒲克趣



洛夫以財政大臣的名義由北京所發出的密碼的電報內容如下：『中國人對於借債事之進行如此遲緩的原因，大約在於李鴻章受列強的反對，其他朝中大臣多不願讓李鴻章幹此勾當。另方面還因英人爲想奪債權爲已有，已向朝中各大臣施與豐厚的賄賂。在總理衙門的官員中散佈一種消息，說我們不情願從旅順口，大連灣撤手去。

蒲克趣洛夫』

沙皇接到這個電報以後，不數日便從彼得格勒給俄國駐華大使葩夫洛夫下列的答覆：

『由蒲克趣洛夫來電之中得知，英人以壟斷債權，以大批金錢收買清廷大臣。因此朕特許你蒲馬克趣洛夫由道勝銀行中提出一百萬盧布，作爲暗地贈送清廷親貴的禮物；不過你們應處處得當，必須使他們真正能保證債權歸我纔行。』

對此優柔的委任之執行，使葩夫洛夫自己不能久耐，而在正月十二號（舊曆二十四號）作了如下的報告：

『昨晚我們很機密的請李鴻章到公使館來，由蒲克趣洛夫告訴他說：假使他能保證使中國政府必借俄債，——必須簽訂條約與佈告——將必提出 500,000 兩給他，以爲補充他在借債運動中的暗昧費用。李鴻章表示十分的同意

，並指出：假使我們能保持債款能按發行的市價——100，他能保證九分成功。今天在總理衙門裏有顯明的變機，李鴻章同翁同龢兩人完全在我們的手腕之下。』

只收買了兩個朝內大臣，在他們還嫌不夠；因此，他們仍繼續作收買清廷大臣的運動。正月十五號，（陽歷二十七號）的電報便有如下的報告：

『昨天我同蒲克趣洛夫密往謁見張蔭桓，以二十萬兩相送，約以與李鴻章同樣的條件。張蔭桓很自負的說，他不獨能爲我們辦理此事，並能承辦其他一切事務。財政大臣翁同龢對於祕密會見頗有躊躇，他怕因爲他同外人通常並無經常的交際，忽然與外人極形親近，將或引起猜疑。但是我已經聽說過，他同他共同分贓的李鴻章照常商量一切。』

在這個電報的原文上，有尼古拉羅曼洛夫——即尼古拉第二之名——親手所寫一句話：『我始終極爲希望借債給中國之事得以成功。』沙皇時常用這樣的言詞來表示自己的聰敏。

但當時最困難的地方，在於租借旅順口及賄賂之繼續無有止期。在一八九八年三月至四月，同樣也在九月中北京俄公使館與彼得格勒時常問有許多電報互相來往，談及

這些困難的問題。下面便是蒲克趣洛夫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九號（舊曆二十一號）給俄財政總長的定期密碼電報：

『得代理大使的同意，我今天曾與李鴻章，張蔭梧作秘密之會談。約定給他們五十萬兩——在我們方面并不算十分大的數目——假使他們能在我們規定的期內將租借旅順口，大連灣的事辦妥。這兩位大臣都極形憂慮，自身境遇之困難及官界的惡劣空氣。清帝（外人稱之爲布格圖汗）接到請願書，要求不要承許我們的要求。明天這兩個大臣將要向清帝作報告。倫敦中國公使致電與北京總衙門說，英國外交部大臣宣告極力反對我們的要求。

蒲克趣洛夫』

同時俄大使葩夫洛夫致電俄政府說：

『北京，一九一八年三月九號。我同蒲克趣洛夫一同十分秘密的與李鴻章，張蔭桓約定，假使他們能夠在三月十五號以前不待我們的極端強迫，而能簽和約，將必送他們每人五十萬兩。』

葩夫洛夫在三月十二號（舊曆二十四號）的電報中便報告了下列的消息：

『預約的酬金引起了負債的行動。李鴻章同張蔭桓顯然的利誘與他大臣及清廷親皇。他們希望在三月十五號會

議上簽約以後，必須快點付與約定之款。我已經很鄭重的請蒲克趣洛夫對此事妥爲辦理。』

沙皇政府對於這種費用自然毫不吝嗇。三月九號俄財政總理維特對於新賄賂直接給了下列的方針：

『我希望你在三月十五號之前，先派你可靠的隨員到旅順口去，並帶相當的款子，以便他在此地運動當地行政機關歸於我們的掌握之中；此外，還須命我們的陸戰隊有相當的行動。此事須同葩夫洛夫商量，並當在最近的將來來電報告。』維特』

葩夫洛夫來電說，爲取得旅順口，大連灣的政權，平均約需250,000—300,000兩之款，以爲助力，或爲贈禮之用。爲維持信用自刻得不容緩預爲準備。

他們對李鴻章長期的等候，而不覺疲倦。大功告成，自然接連着便是清算的時期。三月二十七號（舊曆四月八號）蒲克趣洛夫便向財政總長清報如下：』

『我今天付李鴻章 500,000，在北京日常通用的價秤兩，合銀行所用之（公分）秤486,500兩。李鴻章很滿意，托我深深致謝於你。同時我曾將此事電報若特世敦。我未得機會將款付給張蔭桓，因爲他的境遇極形嚴重。』

但是在同一天幾點鐘以後他又補充的報告說：

我曾與張蔭桓有一機密之會談，涉及付給他……500,000 兩之事。他現在很害怕接收此款，他說，他現在被許多人控告爲被人收買之罪；因此他提議將此事暫緩解決，到流言消沉之後再講。我告訴他，所有約定的款項任何時候都有，隨他自己處置。在旅順現在付出了10,000兩；因爲預約贈款之人因故他往，所以此款還待以後再付。我預定將往旅順一行，大概於本星期日起程。』

張蔭桓所以如此的謹慎，自不無其故。他在這幾月之中顯然幾被逮捕，最後，我們在九月九號（舊曆二十一號）蒲克趣洛夫的電報中便得見不可免的結果：

『控告張蔭桓收賄的結果，使他的家宅被軍隊包圍，抄點他的家產。現在我未曾以分文交給付他。』

#### 蒲克趣洛夫』

張氏被捕，繼則將他決定充軍。至此，被微利所引誘的沙皇代理者也不能不遭遇災難了。張氏在他充軍的前幾天要求給他15,000 兩。蒲克趣洛夫去電報告說：『我對他一無答覆。當他起身到充軍之地的時候，請將此答覆送到保定府，對此事請指示一個方針。』俄外交部問葩夫洛夫對此事的意見，他以為可以滿足張氏的要求。『使中國官吏同我們結下好感，而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顯然對於我

們是很有益的，因為將來某一情勢之下，他們或能給我們以相當之幫助。』——九月二十八號（新歷十月十號）的電報。

給張氏的款就決定交付給他了。

我相信到全世界資產階級政府的秘密文件公佈出來的時候，我們便可見，不獨在這個時期之內，就是現時的中國政治，至少也有一半，便是那些被國際帝國主義所收買，一個得的多的一點——500,000，另一個得的少一點——15,000，將中國出賣的人們所包辦的。如果在某一種情勢之下，中國某一部分商業不大興盛，如是便轉而圖謀使中國政治商品化；中國政府的總長們，在這種貿易之中得『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不知有多少了。中國的大臣們向俄國出賣祖國的證據，我們已經從出乎資本主義世界意料之外的俄國革命後所公布的沙皇秘密文書中得着了。現在在其他各國，雖然還未得到同樣的證據；但是我們可以推想而知，他們在中國所玩的把戲，就是不比沙皇強，也不會弱於沙皇。

假使以為這些事實有辱於中國民族性的自愛，那麼，那麼，我們必須告訴他們，中國的官僚不是絕對的，例外的富於被收買性，沙皇的大臣們，當沙俄借債給外國的時

候，也是同樣的接收賄賂，這是顯然的，無疑義的事實。但是帝國主義的利誘政策最慣於在最後的國家裏運用。德國的財政總長，以前巴格達鐵路及土德銀行的籌劃者格爾斐黎赫說，當他在一九〇二年簽訂土耳其政府借債條約的時候，有許多土耳其的總長直接的向他要求領取賄賂。他因為不久以前纔到任，對於其中內幕不大明瞭，驟然遇見了這樣的事情，以為這些土耳其的總長們對他有所圖謀，不禁稍露怒容。他便向一個拿着一封很有權勢的人所寫的信，（信內囑咐付給該人以任何數目的款）直接將信交給他而向他要求付款的土耳其軍政總長詢問，他直接向他國請求贈禮，他自己也覺得羞恥嗎？這位軍政總長答覆他說：假使我作了與我祖國有害的事，我或不免自羞，但是建築鐵路是對於我的祖國有利益的，那麼，我又何所懼，而不願取得這項酬金呢？

帝國主義——這不獨是帝國主義在壓迫與搶掠殖民地政策，同時並是帝國主義政府收買落後國家的政府，而使其紀綱頹敗的政策。中國的人們，尤其是中國的革命青年，不要將此事引為自己的恥辱，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成為歷史上的定律了。中國政府的荒亂與被收買的時期正是西歐列強施行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不應當將此事實掩飾起來

，而當將他公然的揭露出來；因為如此可以達到兩種目的：第一，使中國了解目前名爲中國人民所主持，實際上爲帝國主義政策所操縱的中國政治之內幕；第二，使我們自己由此養成根本不信仰帝國主義政策之習慣。

帝國主義在中國施行收買政策的時期，現在仍未消滅。我們知道，張作霖之與日本，吳佩孚之與英國互相間有些什麼關係；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最近幾年以來的內閣，始終不過是被帝國主義者所收買的人們所組織成政府。現在因中國民衆之奮起，在中國發生了對於帝國主義較此十倍危險的事件了；他們將不獨以五百萬塊錢收買某一個人，而將利誘整個的階級，收買報紙，組成一個在他們主宰之下的政黨。中國的革命青年，應在中國的歷史中學習，深邃的不信仰，因為在政策上他們將必不只一次同國際帝國主義作暫時的妥協；於此，全部的揣度與「澈底的不信仰」是保證不至於叛變革命的必要條件。中國的革命青年由研究上例——俄國收買李鴻章等的例子——便可知革命者在爭鬥中應堅持之第一原則爲不獨應對於帝國主義澈底的不信仰，更須反對與他——帝國主義——妥協，若非以外交手腕應付之，將必中其收買，誘惑等慣技的政策作絕對的懷疑不可。



假使我們披覽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租界以後的圖畫，我們便可見下列的情況，英國盤踞於長江流域，香港，上海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她在這個時期中幾乎未曾佔據任何地方；因為她所需要地方的，已經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此外，在德國佔據膠洲灣之後，英人則佔有威海衛。德人侵入山東省，預備在列強分割中國之時；將這塊肥肉自己吞下。在南方法國則圖謀佔有中國南部之廣東，雲南兩省，更由此兩省將法國資本輸入四川，把整個的中國南部的商業操在他的掌握之中。在北方則有沙俄之侵襲，沙俄之侵掠中國，不獨只在滿洲北開條路就算了，并要作一條鐵路直達她從日本嘴裏奪出的滿洲南端之旅順口，佔據整個的滿洲與旅順口，以統治北部中國。

在這個時期之中，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又有什麼經濟的侵略呢？第一，全中國民衆不獨擔負由俄國作證人的四萬萬債務，並且擔負了借德英銀行團一千六百萬金鎊，一萬六千萬的借款。其中百分之五是沒有國家的保證的。但是很有興趣的在借債條約規定着，此債之本利須以海關稅為担保，在此後三十六年中還清。徵收權操於管理徵收中國海關的英人之手。如此，中國就很難取得自定稅則的權利。以後，又德英銀行團中借了一萬六千萬金鎊的外債，因

此，中國在轉瞬間担上了大項的國債，一方面有俄國扼其咽喉，另一方面，又有德英銀行團箝制其頸項。

前此中國政府極端反對建築鐵路，現在被強迫着准許了俄國在北方建築西伯利亞大鐵路直通滿洲里，在南方允許了法國建築滇越鐵路，並且在原則上已經廢除了反對建築鐵路的成見。這種變遷會有什麼意義呢？這是因為國際資本主義以前還沒有工具使他們的商品直接暢流於中國之中心，現在還藉建築鐵道以達到其侵略之野心。

此時，帝國主義的列強還未實際的瓜分中國，他們只將中國劃分為四大勢力範圍：法國佔據中國西部，英國盤踞長江流域，俄國佔領中國北部，德國則仍僅於限制山東一省。只有以前佔有中國咽喉，轉眼被其他西歐列強奪去的小日本在一旁流涎觀看。『我們是老練的猛獸，我們的爪牙極為強利，我們要開始漫遊各地』——這便是西歐列強對日本之政策的要意。日本於此也只好專待從西歐帝國主義會餐的桌上拾取他們剩下的殘肉。她失去了山東與遼東半島，被逼迫着去圖謀改造高麗的自慰。日本的公使在此地——高麗——組織了屠殺主持反對日本政策的可佔之運動（此話見於和平的吞併一書中）

在以下我們便可見中國民衆怎樣的起來反抗？一方面

有由康有爲所領導的改良政策，另一方面有由民衆的憤怒所釀成的義和團運動的種種事實。

## 十一

中國現在一切政治上的混亂狀況，起始於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失敗。割讓膠洲，訂結滿洲建築鐵路條約，與列強規定各國在華之勢力範圍，（就是預備瓜分中國）——這些所有事件，在歷史上稱之爲租讓的爭奪時期。這些事件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甚大，但首先表現於中國國內政治上的現象，我們在未說到中國的發展其工業的進步及其對於農村經濟影響之前，我們還要說到，現在這裏所要說的就是挽救中國的從上層做起的改良方法，這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百日史』，在這以下的我們就說到救國的民衆運動，這個就所謂『義和團暴動』。

關於這兩個事件，我們有豐富的材料，不但可以研究他發展的一般路綫，並且還能見到其具體的事實，關於『百日史』即關於從上層做起的改良政策，詳述於康有爲的弟子所著（國家變法與反動史）三本中文書中，不能讀中文的還有英文的，名爲『中國危機內部原因觀』，係根據此書面寫的。此外德人的中國教授福浪哥曾將康有爲的七

篇奏摺譯成法文，還有根據康有為奏摺的一篇報告曾譯成法文，一八九一年在上海出版的。這些譯品能使我深刻的了解，這『百日史』的內容與其重要。

誰都知道的，資本主義世界代表者，在中日戰爭以後都怎樣的對中國悲觀。我（著者）以前曾引證過，英國外交總長凱爾遜的話。他攷察了中國的情形，并看過中日戰爭失敗後的影响，以後，就評斷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抬頭起來，我（全上）也曾說過那個英國對外政策問題主要作者之一旗洛亮，他也是全樣意見的，當他從遠東歸國之時，他說中國沒有自救能力了。

世界著名的地形學家雷克洛（係一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〇〇年所著書中關於中國問題說，現在歐人對中國前途的估計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說中國應瓜分；有些人說中國將被日本吞併，日本用中國廣大的工具將與歐洲人爭鬥，倘有人問，究竟應是怎樣辦呢？於是有第三者就說；允許中國獨立，儘量的輸入鴉片煙，毒害中國人，使他很穩靜的頹靡下去走入死路。

特別明顯，中國各階級對於中國前途的推測，不能那樣很安心的估計中國四萬萬的民衆應當消滅。

就是在中國腐敗官僚之中，亦有很多不滿意這些觀點

的，我們知道中國戰敗之後，立刻在北京召集一個官長會議，在此會議場上，有數千人一致贊成通過議決案，主張繼續戰爭，反對政府的投降。

在這些多少表示進步的中國官僚中有激烈的分子以康有爲的廣東人的先進小政團爲首領。康有爲在戰敗（中日戰爭）前已提倡變法，他于一八八七年已呈過第一次奏摺，批評中國現況的腐敗并提出挽救的方法。

康有爲的奏摺是非常有趣的，第一，康有爲很明白，中國國際地位的危機。當讀他的奏摺時，把現在才公佈的當時列強各國公使間的祕密外交文件比較一下，我們對康有爲關於中國時勢的估計的那樣清楚真該驚異。康有爲在他估計時局的奏摺中反覆在述俄國當時對中國是最危險的國家。他又說英國爲商業國，恐懼戰爭，（在當時是對的），英國對華之貿易佔百分之八十，此時幾乎佔中國之全數貿易，他能操必勝之權，英國比俄國無論在政治上及技術的條件上開始宣戰都要困難，俄國是中國的鄰國，民衆與皇帝專制的關係如手與足，俄皇方面的恐嚇實有加倍的危險。康有爲知道：假設俄皇對中國開始侵略政策，則英國與日本決不會同俄國開戰而起來救中國的，反之——俟俄國開始宰割中國，他們便把中國放在十字架上，共同分宰

中國。因此，康有為在他第一次奏摺上問道，怎麼辦？他批評中國內部的情形及說出以下的實際狀況：『各地賄賂公行，法律點評』其次他又說到小日本因明治變法而成爲現代強國，中國亦應走向變法之路。他提出變法不能僅從上層進行，爲使民衆明瞭起見，他向政府要求容納各種變法意見。一八八七年他的奏摺毫無結果：檢察官都害怕這個奏摺，也不相信政府能夠採納，後來康有為去南方，到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後他又回到北京，并起始宣傳變法，經過幾年中國受種種恥辱之後，然後他的主張，意見和觀點起了力量。

中國擾亂激迫康有為出亡國外，繼續研究，一八九五年後又遞呈政府六個奏摺，詳說政治經濟發展的綱領，這幾項是在外國研究的結果。

我們僅說他意見書中的幾點，來估量康有為主張變法的社會內容，因康有為是最能代表，中國官僚中進步分子的資產階級的性質。

康有為說，爲增加人民的幸福，必要實行四種策略——幫助農業，挽救手工業，扶助商業，周濟貧民。關於農業問題，意大利，法國的政府方面特別幫助養蠶業，在錫蘭島獎勵種茶葉，以與中國茶業競爭。中國政府亦應作同

樣的幫助絲茶商業。歐洲扶助手工業而得，氣機，電氣，鐵路，軍備等的發展，各國爲手工業及農業創造專門的學校，中國各省亦應做効行之。我們的對外貿易因爲沒有幫助，雖然我們國家很富，而不能去遠方與外國貿易品競爭。應當創造商業學校，扶助組織商業公司，取消釐金。中國大使應當研究外國情形；中國應創辦重工業，中國因人民過剩及缺乏工業以致國民間有大批貧民。皇帝更不知道有多少貧民，爲救濟這些貧民，應當獎勵向新疆，蒙古，及滿洲等處殖民，政府應扶助在彼處組成殖民地，爲達到此目的，必要建築鐵路，應當扶助人民的工業及手工業，應當創辦爲失業工人及無業工人的教育學校，應當顧慮貧民及孤子，爲達到這些目的，應當改良教育制度，取消中國舊式的考試制度，應當建立專門學校，扶助國民智識的發展，國民的智識就是表示國家的力量，中國人每百人僅有二十人識字者。

康有爲的奏摺，按政綱的實質上，專於未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綱：農業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殖民到廣大土地的蒙古，新疆，滿洲去；發展手工業，工業，鐵路，還有這些條件，——就是普及教育。

幾年前李鴻章曾建立天津北京間電報傳達機關，但遇

官吏方面的怠工，而康有為雖然也是官僚性，但完全是新形式的，是不怕技術進步歐洲文明的一種官吏。

康有為並不是完全除舊的，在他的奏摺中還推崇孔子的學說，這就證明他還與舊制度有親密的連繫。中國所存在社會關係，就是放棄孔子學說的結果，而代以官僚習氣的老形式，他說一切經濟實行改良，使孔子學說重新復活。

什麼是孔子學說呢？『孔子學說給世人以兩種正確的觀念——人類統一的觀念與和平的觀念，欲其實現必須以孔子學說統一世界。』康有為不明白人類統一觀念為一切大宗教所共有其目的即在征服世界，中世紀強大的霸國都是在此理論下存在的，他們欲侵佔全世界。舉個例來說，德國皇帝中世紀時在歐洲很猛烈的作那種帝皇的侵略。羅馬教皇與德國皇帝共同擁護這種思想，此思想很明顯的非孔子學說的特點。

康有為或者不很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見，或者在他擁護孔子，不過為避免破壞舊制度的責難而已。他在奏摺中說中國的興革，如下寫道：『應當武裝中國』。我們有軍艦，而我們不能使用，我們有大使館，但不知怎作大使，我們有受過外國式訓練的軍隊，而沒有很好的方法統



率軍隊，我們有兵工廠造船廠，而沒有機器，我們有外交部，但沒有熟悉外國情形的外交大臣，我們有汽船公司，但沒有航國外的汽船。關於學校問題他說有以下的話：『不應對民衆施行那種不適合於現代環境的教育。』

一八九七年後的奏摺，康有為很清楚的描寫出中國混亂的現象，說明帝國主義侵入，又再三言及中國內部的情形，康有為在當時的主張實如現代資產階級式的改革家一樣，他說，我很恐怕皇帝與他的高等顧問把一切目的都為愛護和平，從早到晚玩耍跳舞，安享逸樂，而消磨歲月，使他們很快的不能生存於此環境之中。我恐怕皇帝與他的諸侯將相沉於逸安，穿戴華服——他們不能存在於將來。『我們當指示與官民，舊生活應當結束，而代之以新生活，當選擇國內能幹人才，為實行變法的計劃，各國法律中都選擇很好的國民憲法模範，當選出國中有才能的官吏——他們是很有益於國家的，當取消陳腐不良的官僚，選擇有才幹的青年資送外國留學，其餘不能出洋的當撤消其政府職務，國家當實行管理及統計年中的收穫，並勞働人口，為着作每年的預算，當攷察所有的損失——國家收入與消費——為着我們採用相當的方法，當借外債以助國家變

法，皇帝應當諭告全國頭腦覺醒，而有教育的民衆及號召全國各處新象，新希望的人們奮起，當除去舊式官僚的行動，吸收新人才，應當增加官吏的薪俸，使其適合自己生活的程度，應當取消買賣官職，當廢除民衆不能作官的法則；創辦專門訓練官吏學習所；當頒布新土地法；保護人民；組織慈善事業局，注意人民的健康；顧慮人民的貧困；應當改良我們的監獄；當取消我們野蠻的刑罰；當增加鴉片稅，取消釐金；應當建築鐵路及建造軍艦以保護國家。

康有爲提議每省有三萬兵士受現代的軍事教育。

我們看一看，這完全是資產階級改良式的政綱。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他所呈的五大奏摺在德人佔領膠洲之後，康有爲對此問題的考究從書經上引證了四點寫之於下：

『歐洲大國每年收入以萬億計，有訓練之精兵以百萬計。祿艦軍艦數百艘，彼有現代之科學智識，彼有最新之機器，而每年且有千百種之新發明及新出之書籍，無數量之農工商賈，兵士學生，皆各有其專門研習之之學科，婦人女子，青年兒童皆能讀書識字。而我國每年收入平均不過七千萬（除開一八九四年至九

五年中日戰後，償付日本軍費以外），此我國之財政弱于人也。有訓練之精兵與軍艦我國皆無之，此我國軍事之弱于人也。至於現代之科學智識，現代之技術，自無庸言矣，此我國學術之弱于人也。我國軍隊全無教育，即教育亦絕無講授軍事之設備，我國商人從未進過學校，我國農人皆是愚蠢而衆多。此我國教育之弱于人也。我國民是若此冷靜沉默，絕鮮精奮強烈之熱忱。此我國民性之弱于人也。於是我故鑄以『窮話』『弱者宜爲奴役也』。

我四千年來絕無尺進，處在列強角逐之時代，我則甘居落後不求學識。我國之貴官顯宦，只知墨守舊章所謂『讀先帝遺訓而效法之，則夷狄化之矣』。其拘守頑陋之舊學與虛文儀禮，致常被外人竊笑爲只講外表虛文而內容全無者，我國無研習應時適用之學，因此於中日，中法之戰皆得辱國喪地之果，而猶不知勵精圖治。於是而復有今日之恥辱（膠州灣之被佔據）居於四萬萬人民之上者不過百十人文武大員而已。彼等從未曾踏出國門一步，亦從不識現代歐洲憲政文物爲何。在此凋敝困乏之年往時所頑陋之學校國子監本已朽廢不堪，其所誦習不過一點舊章古訓而已。

并無有適時新學。通習外國時務者。其所習見習聞只限於一些古說陳義。其討論皆千遍一律毫無所見。與友朋知識相往來常靜默相對，恂恂如也。其所感觸，所思維、所見識，所注意祇盤旋迴繞於古訓之範圍以內，而復妄自尊大高傲自慢，只圖個人親族之私利而不知有他。他方面，外人之遊歷於我國者與宣教師等，則研習中國情形，考究中國政治經濟文物出產，製列各種圖表寫之成章，載之報端以便利其民。因此宜絕滅守舊之孽障，而奮勵於新思想之灌輸，此當前之急務也。我於是而視之以『窮話』『愚蠢者宜受懲創也』。

○ 我國自對外累次喪敗以來，我政府之累累失信外人皆知之矣。我國民本無實力，山地邊界蠻野番族蠢然思亂。內地各省則教民與平民之間，累起教案之紛擾，此等紛擾，我等既無實力之準備，則徒遣外人以藉口之資，促使外人協以謀我而已。若俄之壓平回亂，佔領伊犁此往事之鑑也。因是而有我之『窮話』『紛亂足以致遭亡國也』。

○ 論及歐人瓜分中國之陰謀，則吾儕見夫非洲之被列強分割；波蘭之被俄德瓜分；法之佔領安南；英滅

印度，當已不寒而慄矣。而我朝廷大臣上下猶復漠然無動于中，袖手危坐妄希天幸，一八八四——九四年之恥敗已過，從不曾有人發憤自勵以圖自強而救國者，此等現象誠爲自古以來所未見，而我朝廷親王大臣下及草野庶民，盡皆已墮爲外人之奴役，被外人竊視爲犬羊之不若矣，而猶熙熙攘攘晏安其生活不知恥。噫！人莫悲于心死，病莫悲于癆瘵，離枝之葉，凋萎之花至可傷也。吾因是視以『窮話』『人心之銷沉宜使振作也』。

欲求強鄰之助而藉以自保其獨立，其可能乎？歐人軍事之侵略，在乎勝敵而不必在乎滅人國。德與俄勢均力敵之國也，彼等可以因我而用兵力以爭鬥，然而我則終難免爲俎上肉任人之割割矣。

論及歐人之侵略亞洲則當迴憶昔時土耳其人之先例，土耳其雖至今猶存，然其廣大之疆土則不轉瞬而被列強割奪以去矣。再或以波斯爲例，波斯雖至今還保存其原有之疆土然其強盛威武之國勢，則已被歐人摧奪盡矣。中國有廣袤之疆土固龐然大國也，而幾年來則盡皆被歐洲列強割分勢力範圍而佔據盡矣。中國之柄權執政者皆衰老枯槁奄奄垂斃之人耳，欲其國之

可乎。昔土耳其有謨漢墨德之教，其人民之強悍至爲歐人所畏懼，我國之教之何如？——懦弱與退讓，萎靡不振，形容枯槁，此我國民之表徵也。波斯國尚遍遊西歐各國，而我之親王兒子及在朝柄政者，則深閉宮禁獨修其德耳。有外國使臣遊歷我國以觀察所得露布于世界各國之報端，竟倡言亞洲古國近已日就衰落，應即取而據之也。而我國人則反充耳不聞，晏然自若如駮駘之子聊以自欺者，吾國人正若斯人，屋中火起不知用水以撲火，而徒號叫呼救，及火之延燒近身，而彼猶復擁護財寶不肯捨棄，終至喪死，而財物亦同歸于燼。吾故曰，我國之執政者不忠于君不愛其國。彼等所纏繞思維者，絕皆個人之私利，至其終也，非惟國以滅亡而個人私利亦不保。皇上宜三思晉宋之亡于外族，土耳其，波斯之衰墮，以爲借鑑，太后縱不一思其國，亦應知鑑于太后之往事也。今則朝廷皆拱手低頭而坐，欲其反抗外人之貪求，則靜待新來之恥辱與喪敗耳。膠洲之事變——其致有今日此種外來之災禍，亦昔日之積弱與不自振作之結果也，吾甯不避斧鉞詳陳一切已非一次矣。吾於今日不能立陳護國大計，此應於平時靜思密察而後可也。膠洲之禍患則

在目前，切願陛下憤強鄰之侵凌，奮其全力以圖強，下詔罪己以鼓舞民心。然後與吾民併力以雪恥，陛下宜誠懇以諮詢于人民，則上下之隔閡以除，假能使輿情上達，則能知一切吏治之利弊，而帝位以固，改革於以進行。……』

我們此外，還能從康有為的演說中指出一點，這是康有為在一八九七年在北京保國會的演說，在這演說中康有為發表要求開國會他說：『國會是代表國民的意志與願望的，在國會中的權力皇帝不能更大，國民不會更小，而必以國民之利益為先。此義適合古聖賢遺志，泰西各國用此而富強，我國政府并無計及國民之要求，既無根本法律以保護人民，國皇與人民之間又無聯系，凡百政事決于一尊而萬民默從，此與古聖賢之遺訓大相違者也。』

完全明白了，這是推出古聖賢來，只是策略的應用而已。無論為孔子或為孟子，你總尋不出國會制度來，很明顯的，康有為企圖以改良變法穿起花的外套以便易於進行而已。

在皇朝通考上還有幾個很有趣味的歷史事件。可以同中國改革派人在這短時期中所做的是些什麼事來相對照一下。

康有爲還是個著名的歷史著作者，在他的歷史著作中，曾有關於彼得大帝改革事件的記述，真的，他還不能夠給自己一個明白瞭解，這種改革並不是彼得帝個人的事業——他還沒有比得上現在的受包克羅夫指導的每個大學生所知道的。不過事實是這樣，康有爲是要研究外國的變法改革之先例而已。他敘述關於波蘭的滅亡原因，他記敘關於土耳其的強盛與衰落的原因，換句話說，他是要研究一個國家的衰落，兼要研究新強國的興起，這是要利用國家之盛衰以爲中國國民之借鑑而已。

康有爲的著述得了很廣大的普遍傳布（爲當時唯一的宣傳品），惹起了官場中紛紛議論；且引起政界官吏的派別分歧，不但滿洲貴族自己佔統治地位的分子起來反對這種新的改革，就是大部分的中小漢人官吏也都起來反對。這種分派的原因是在於改革派的反對者的物質利益。這點，法蘭西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是很懂得的。他說當在學部會議提出廢止舊的科舉制的時候，只有很少數人贊成改革派的意見。科舉制度本是根據於文藝詞章的通曉以爲拔取官吏的標準。行科舉制，最初起於漢朝。實際上這種科舉制是含有反對封建制度的進步的方法。在封建制度時候，能做官吏的多條件要決於土地，即是有土地的地主才能做官。



漢朝試欲吸引商人農民來治理國家，因此，以科舉取士，須通曉古聖賢經傳為準則，而不根據於田產財物來定官職。中國那時離古不遠，人民之見聞于聖賢的比今更多。真的，一個美國的學制改良者，于十九世紀時，是那麼樣的歡迎這種科舉制度的。他要求在美國採取這種制度。但他却沒有看見——這是漢朝時代所行的科舉制，在實際上科舉提拔的並不那樣，誰能通曉文藝誰能為官，而科舉制曾經實行公開的或私地的買賣。現在官場中（當康有為改革時）這種官爵買賣，舊的科舉取士已經提議取消了，能做官吏的，只有那種能夠改革中國以圖強的人。他知（法國歷史家）道這種官吏要絕對要拋棄自己私人的利益而贊成康有為這是不會的，只有大部份思想先進的分子與青年，他們這沒有得到任何官職的，才會跑過康有為這邊來。

康有為皇朝通考的出版成為康有為的大的宣傳品。

皇室之守舊派最初就要求逮捕康有為。青年的光緒帝乃反之。感慨於中國疆土之日蹙，並又感受他的師傅的影響——於是站在改革派一方面。康有為於是受命為總理衙門大臣之一。

嗣後他能直接謁見清帝了。於1898年六月十一日他謁見光緒帝之後，於是光緒帝的詔令乃如雨下。光緒帝蓋欲

得詔令之助力以救國了。新定法律頒布改良科舉制度，改革學校，淘汰冗吏官員，遍設新聞機關。照光緒帝的意思，以為官僚應自己來開導國民，應該來證明給人民，凡是官吏都是不可靠的。……

在這些詔令中仍反映出康有為的企圖，以改革事業託原於孔夫子的學說。而且以統治階級的舊觀點發表直接革命的主張。光緒帝最確切的宣布（1898年九月十三日的詔書）說，泰西各國的凡百學術，皆超出於中國之上，其國家政治是可以增進人民羣衆幸福為唯一任務。他是能有遠見的，而同時，我中國的政治則脫離於人民的生活的。如此生活下去，從此以後我們是絕對的不能的了。……

很容易明白的，這根本改革的企圖，要是單靠清帝對外患的畏懼，及他的顧問與幾個維新派人之身上，同時統治階級全體反對這種改革運動國民羣衆則莫不關心于國事，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得的結果當然只有失敗，蹈羅禍患而已。

反對清帝改革政策的中心非常明顯的，就是慈禧皇太后。她是依賴舊官僚及宮廷內宦等分子。

顯然，康有為還要以宮廷政變的手段來企圖剷除改革的障礙。在慈禧太后手中的主要工具是直隸總督榮祿。他

是當時唯一的武裝力量的司令官。他們軍隊是數年以來在德國教練官的訓練之下所練成的軍隊。康有為要求光緒帝把榮祿撤職，并把他的軍隊，調給較為進步的李鴻章與袁世凱管領。後光緒帝曾有詔逮捕榮祿並將其處死，最後還預備完成宮廷的政變而拘捕太后。

但是，袁世凱得到詔書之後，估計了那時勢關係，卻寧將這些計劃與詔書統統報告于太后與榮祿。結果，太后就迅速的將光緒帝囚禁起來，逮捕維新派官員。康有為因以先數日得到光緒帝之密諭得脫出北京。

有一個康有為最親近的弟子，有幾句話說到這次改革企圖的慘劇。他說，當光緒帝被拘禁時有忠于帝的人獻議于帝，叫帝逃亡。光緒帝辭謝他以很有趣味的關於此次政變的話，這句話真是成為『百日史』的格言；他這樣的說道：『我雖然知道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什麼，但我又能那樣做啦。』

維新派他是官僚中之一部分，他們能明了中國的一切困難，一切危險可怕的地位，他們也能提出完滿切實的改革政綱，但他們沒有找到在中國社會的任何擁護的力量來推行這種改良的政綱。羣衆在維新時期之前九十年代中在各地蜂起的原始的排外騷動已受打擊了。維新派是隔離了

羣衆，也不能鼓起羣衆。官僚階級自身是不能進行改革的，因為改革與他的自身的利益衝突，這次改革的進行，爲時非常短促。她只能表現出這種改革是爲當時所需要的而已，至于能夠去推行這種改革的社會基礎力量還是沒有。

當時有譚嗣同的至友叫他（嗣同）逃走，他同光緒帝一樣的拒絕，他所表示的意見是很值得我們的注意的；他說：『任何國家如沒有流過血是不能推行改革的，我沒有聽到過在中國曾有因改革而流血。所以我國家是這樣不幸呢。』這個維新者，和他的同志欲做一個爲國而犧牲的模範。他欲流血，以爲先有流血，而後才能實行改革…等。

歐洲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對於這次改革的評量，證明出來，他們（資產階級歷史家）了解這『百日史』的意義比自己參加于改革的人所懂得的還要少些。例如法國研究中國史學家的高爾特（Clogl），中國衰落史的著者，對於改革派的批評，以爲他們（改革派）太過於欲求速成，就因此而失敗了。而其實改革派是不能不欲求速成的，因爲中國瓜分之禍已迫在目前，他們的失敗不是因爲欲求速成改革，而是因爲還沒有人民羣衆的基礎以推行這個革命。

對於這次中國改革的企圖我們所作的歷史評量，應該是怎樣呢？

這段極深刻的慘史很有許多地方可以同俄國十二月黨的暴動事件相參照。在俄國當時也成熟了有改革的必要了，而同時還沒有社會的羣衆力量，來推行這種改革。十二月黨從統治階級中出來也同中國改革派的從官僚階級中出來一樣。他們也已懂得改革的需要了，但是同樣地還沒有把人民羣衆鼓勵起來。十二月黨同譚嗣同那派人一樣，他們但能夠當着砲台的砲口所瞄準的空場上站立着去送死而已。進步的康有爲派比十二月黨的改革派更其能夠明白了自己所做的意義。十二月黨中只有一部人是那樣明瞭解放農奴與消滅沙皇制度的必要，如同中國的改革派在當時所要求的一樣？在十二月黨的敗滅以後，歐洲的更加速發展是促使康有爲的門人與其同志等能夠有那樣的趨向。不過在實事上無論是十二月黨或康有爲派都不是從資產階級內出來的，都是還沒有資產階級發展的可能的。現在中國的改革者與革命者，應視康有爲派這次改革運動爲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他們應懂得二個很深刻的教訓。如前所引康有爲的門人光緒帝的話所表現的，僅僅知道中國的所需要的還是不能夠做的；要能夠將這種需要與人民羣衆相結合，

還要把譚嗣同的行動與人民羣衆的行動結合起來。關於改革者的革命意志的堅決，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堅決是與自己改革的事業的成敗有密切關係。我們對於譚嗣同關於流血的話是異于他自己所解釋的。僅僅知識階級的勇毅與流血是不夠的，還要靠鬥爭行動與人民羣衆。這種鬥爭當然是不能避免流血，鬥爭不是在乎以流血愈多爲目的，流血不應是個人的，不是離開羣衆的，這犧牲流血的人是要與人民羣衆連結起來的，康有爲派還沒曾提出那樣問題過，但我們則不能不尊敬他們的英勇，以那樣小的團體竟會有那樣英勇無畏的理想。

事情往往在做過去以後則容易瞭解些。當我們去鬥爭去犧牲的時候，那我們已經很好的將會知道，如我們站在廣大羣衆之上是沒有一滴血會空空洗掉的。但當康有爲與其黨徒視死如歸的時候，他們却不能那樣自信呢？

在他們失敗後約經過了三十年在中國又發生最激烈的革命，這革命是有廣大羣衆來參加，這事實便證明，他們的事業在歷史的需要上不是偶然的，不是所謂無關輕重的歷史插話。沒有這個事業，那中國革命者的一切繼續鬥爭都不能有，如現在這樣爆發的偉大的革命的。

當我們說到國民黨的產生，說到在孫逸仙的號召之下

革命運動之進行，以及同康有為派還存留于今的黨徒作鬥爭的時候，那我們就可看見孫逸仙很能夠了解康有為失敗的原因。這官僚階級是不能自己改革的，要改革必須求之于別個階級才可以。康有為的失敗，正是需要的，因為繼續而起的新的革命者可以從這種失敗當中找出新的道路來。

## 十一

自政變之後，寡居深宮的慈禧太后所統治的滿清政局頓形嚴重。一方面中國南部，發生很多同情于康有為的組織痛詆清廷，認為這次政變，不但是反對變法，完全是反對漢人；即是滿清政府要反對漢族。同時，在中國的各地又起一種反對外人的民族運動。我們據歷史上的材料，知道這種運動，於一八九一年已經開始了。從這一年起民間開始組織了一些團體大責滿清政府之賣國行爲。

在兩種勢焰之中，清廷不勝恐懼，一方面有立於反對地位之康有為派，這一派是代表社會上智識階級的意見，而主張變法的。他方面，又有反對外人勢力的民衆運動的突起。這種民衆運動是什麼的性質呢？他的根原，就是基於資本主義之侵入，引起中國的生活情形破壞中的民衆憤

憑而來。於此很饒興趣的就是當時外交界電報（可是我們知道，當時的外交家的攷察，距原因的真相還遠，因為他們所見的，還只是外表。）也常常把引起這種運動的經濟動因，屢次的指明出來過。

自然在我們看來，他們所說的是很乾燥而不充分的。他們記述的，第一是當時有許多的旱災，使農民破產——北方尤其利害，似乎農民把這種旱災，與政府的外交政策失敗聯想起來了，以對外人的讓步，遂使他們受神的處罰。這種天災與外人侵略的關係在直隸省人民的目前，更為切近。因此比如京津鐵路的建設，就使一部分職業的人完全崩壞。所以在這些城池的運動，非常的利害；這就是表顯很多農民羣衆破產的結果。這便是外交家所指出的這次運動的第二個經濟原因。要是我們有多一點直接的經濟史料，一定的，還可以找出當時的很多經濟原因。

因為科學的論據，不能在所知以外去空想的。所以我們只能就現在在歷史中所尋出的而說。

這次運動的普遍的狀況，以及他一般的情感，却是表示反對外國人的侵入。這種反對外國人的侵入，自然能夠得中國社會上的守舊派的與朝廷方面守舊派的同情，他們漸漸傾向於幫助這次運動。我們有一個很珍貴的好證據，



根據這個好證據，很可以逐日的找出拳變內幕中的歷史。英國軍事當局，在佔領北京，從事搶掠之時，得着二本中國朝中的親貴老臣景善（年已七十）的日記，他的兒子也居要津，七部堂官，都是他的親近。可是這個老頭是一個聾子，在他的日記中記載：有人說，北京在打礮，可是我沒有聽見。他把他所得的報告，每天都寫得很詳細，據此，我們可以看見朝中與義和團運動關係是如何的變化。

此外在我們手裏，還有許多反對義和團的人們的奏稿。上面我們說過，直隸總督榮祿的軍隊，在當時是中國唯一的新軍。榮祿便是反對義和團之亂的人。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問題，在上政府的奏稿中，屢次表示其反對的意見，還可以指出，例如，外部尚書袁昶的三個奏稿，他很明白外國方面，將與中國以莫大的危險。這些證據，把朝中怎樣對待義和團運動，全盤托出了。

這裏有樸蘭德與白克好志著作的一本書，其名爲『寡居皇太后治下之中國』。他們是英國人，這兩位當時住在北京，很接近外交界，與政界也有不少的關係。

榮祿在最初便預言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可是慈禧太后恐怕，要是政府不利用義和團運動，恐怕他反過來反對她，她怕新的祕密運動；並且他也恨外國人。因此二種原因

，她肯贊助包圍着她的臣下們。要是觀察他們的行動，這是很有趣味的。政府方面，自己完全沒有打算實力的關係（在中日戰爭後，對所有的歐洲資本主義都已經讓步了）他們自己完全沒打算到以後的事，不是與平時中國內部的勢力相持，而是與強有力的歐洲資本主義作戰。他們完全是迷信，譬如他們說義和團是打不死的，在這種奏摺中我們看見，袁世凱究竟怎樣解決這個信仰問題，他把義和團叫來，命令兵士向之射擊，因為義和團還是一個樣死，所以袁世凱馬上便穩健起來了。可是清廷方面仍然是深信義和團的法力，躲得了槍砲。朝廷方面的宇宙觀，還是在普通農民發展的水平線上。在大臣景善的日記中記載，義和團圍攻住在北京的外國人的時候，他聽說，有人看見在外人住宅的附近死很多的義和團。那些相信義和團不死的人，初聽着義和團打得死，便起很大的恐慌，可是皇太后還是相信義和團的民衆運動，可以撲滅外人的。所以她決定設法幫助義和團，她命令各省的副軍組織義和團的民軍，並且命滿洲軍隊幫助義和團。

這個命令頒布之後，直隸總督便一封信給皇太后：『要是許可義和團的發展，那嗎，我們便失掉了監督他們的能力，唯一的結果，便是混亂。』（他一定知道在混亂之

下，就會有革命發生)。

他向滿政府條呈，以爲利用這種民衆運動，是危險的。他以爲民衆運動，沒有多大的力量，他說民衆雖嫉恨外人太甚，但這種力量趕走外人是不夠的，可是反過來便有反朝廷之可能。他指出南方的秘密會社，革命團體的會員很多，而其失意的人以及匪徒等，都在俟機而起，以反對朝綱。幫助義和團運動，就等于是投火于充滿爆發物的窖藏。

他又通知與他接近的制軍們，叫不要奉皇太后的詔，並且不要幫助義和團運動。

皇太后與朝廷中，置各種勸告於不顧，還以國家的正式公文，令各制軍賞賜打死外人者。義和團得端王的領率，政府的同情，各地方的幫助，發展之速，有如波濤洶湧一般，遍及北方，還有一部分蔓延到中國的中部。

我們知道，以後就發生下面的一些事：當義和團一到北京，最初就打死日本使館的書記衫山彬，以後又打死最後一次到外交部的德國公使克德林。殺克德林的兇手便是禁衛軍的兵士。這次事變之後，把他捕着，審訊他的時候，他明白的，安靜的供稱，因爲政府命令殺死外國人，他在值班，遇着公使，所以便把他打死了。

皇太后得着打死公使的消息，非常高興。她完全沒想到打死公使，要引起政治方面的嚴重交涉，也沒有想到爲這回事，中國又要擔負大批賠款。

端王對於這件事情，更高興非常，並且給打死克德林的人，以重大的賞賜，在他的眼光中，以爲打死外國的名人，比打死一個蠻子的功大。榮祿與他一派的人——比較明時事的官僚，向政府呈述，說這件事情，比打死一個教士嚴重些，可以引起歐洲各資本主義者的一致行動，以反對中國。可是清廷命令他們不許發言。

以後義和團正式的圍攻使館。可是他們的組織，武器軍備等等，都非常薄弱。由這事實，可看得出來，就是保護使館的歐洲兵士，只有四百人，可能支持幾個星期，一直等到保衛使館的大隊開到，他們的犧牲，一共才一百人，義和團方面，死幾萬人。而歐洲人都是新式的武器。榮祿當時有歐洲式的礮兵，因爲是圍攻使館，榮祿不肯以大礮供給義和團的領袖，當時還以免職恐嚇他。榮祿回答道：『你奉皇后的詔，來把我的頭殺了，同大礮一塊拿去。』他自己打算到，要是義和團把所有的公使打死了，那嗎，聯軍有破壞一切條約的可能。所有的滿朝親貴，看這位反對殺歐洲各公使的人，彷彿看沒人一樣，都認爲朝廷

的叛臣。

在景善的日記中很清楚的寫出滿人的恐怖，以爲滿政府的利益，在漢人官僚方面，是不重視的，就是深居高位的滿人，對這種利益，也是完全不保護的。

在他方面看起來，義和團在北京，自視他們是主人的地位了。我們由景善的日記中，看見他常常怕這種運動，變成了旁的性質。他很嚇異的說，譬如端王同義和團的領袖拉手，——他不過是一個平民；又說義和團在北京，可與滿洲官員平等的。他又記載義和團在他的院內排隊，他又怕他們搶他，又描寫這種情形。就是義和團去見皇太后，把紫禁城的大門都弄壞了，以太后的鎮靜，與隨侍他的榮祿所轄的禁衛軍，才把他們擋阻了。可是以前，就是奉太后的詔而來爲皇帝看病的太醫，也不敢仰望病症，他要辯認皇帝舌苔，也憑太后一紙書罷了。他在太后及皇帝的面前，完全是跪着，眼睛只能望着他。此次義和團的兵士，在宮庭裏喧鬧，皇太后還要親自出來見，並且親自命令他們走。

這一次幼稚的運動，照事實看起來，是一種反動的，因爲它保護舊制度，如果它擾亂京城，完全脫離政府的羈絆，那嗎，這一次運動恐怕不僅成爲反對外人，而且要反

對政府。

在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就引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對。義和團運動，引起了全資本主義的歐洲對中國的覬覦。以前各列強在中國的利益，還在有限範圍之內，中國與歐洲的經濟關係，還非常薄弱；與一般資本家的接觸並不廣大，可是現在，我們看一看，完全改變了。在中國反對資本主義運動的時候，資本家就合作起來了。與中國有商業關係的，一部份資產階級佔領中國的慾望，因之使得全歐洲及美洲資本主義世界的援助。

資本主義的出版界以爲義和團運動，彷彿是黃種人的本性，他們記載此次事實，不是歐洲資本主義者宰割中國，搶掠中國的結果；乃是中國突然起來反對文化與文明，而想佔領全世界的事變。很明顯的，這些政府自己很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是歐洲政府中不很聰明的人也知道這個事，大家知道的，俄皇尼古拉第二，在歐洲資本主義的頭腦中，並不是最聰明的，特出的。在俄國有一個故事，要是誰說：『皇帝是傻子』，在法庭上就是發咒來辯白說他是指德國皇帝，可是法庭不相信他的，不要胡說，你要是說到傻子，除了尼古拉，那裏還有第二個，可是這次尼古拉也會親自的訓令駐巴黎公使的電稿上道：我完全

贊成，可是對法國還有一個急切的問題，就是關於教士們。我以為這些先生——就是罪惡之本；他們與商人狼狽為奸以致激起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嫉視。無論如何說法，都應該設法限制他們，藉那耶蘇的聖名，以剝削中國民衆。沙皇都很知道，一方面是商人侵略中國民族；他方面教士以保護宗教為名以助長之。至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都打起保護宗教，保護歐洲文明的口號，因為黃種蠻人不願意外國人隨便統治中國。

中國的事件，引起德國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打死了德國公使；最重要的，便是以前德國在中國什麼也沒有得着，德皇曾想於遠東方面，在先進列強之中，佔一個地位。自然，他想藉公使被殺的事件，得多一點兒。

因此德皇威廉第二，便成為征伐黃種人的領袖。他向歐洲各國，請求一致行動，並且同時組織聯軍使在中國的軍隊都受他指揮。而主張以德國伯爵瓦德為元帥統率之。德國想這樣的利用義和團運動，在遠東方面。彷彿是領導其他列強行動的一個國家，其他國家是不很高興這回事的，所以在高喊「黃禍」之前，資本主義列強當中，馬上就起了裂痕。

沙皇時代的俄國，佔着最好的地位，他佔得了滿洲，

他不願意列強佔得像他這樣的多。他怕在中國發生更大的共管，那嗎，英國人會要佔領揚子江流，因此俄皇對於這個問題，便取觀望的態度。當着有人告訴他，俄公使也在危險中，他灑一滴照例的眼淚，可是他不馬上派大的隊部伍到中國。因為他知道西北利亞的鐵路，還沒有完全修好，原是在中國的戰事擴大了，英國可以從海道運印度的兵，那末，英國仍比俄國要厲害些，因為俄國運兵困難。

英國爲着自己方面，馬上向德國要求：英國承認瓦德當元帥，可是要承認揚子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於是開始協商，這就是以後英德條約，成爲當時重要的政治條約之一。因為德國承認中國的最富庶最繁盛的區域，算英國的特殊利益。

結果，德俄英諸國的遠征隊，便在天津登陸，毀壞了大沽。後來到北京的前隊，還在京津鐵路中間，打了一個敗仗，以後歐洲軍隊增加，北京使館的圍便解了。寡居的皇太后見到列強佔領了要隘，便怕起來了。而中國的正式軍隊，又奉命不幫助義和團了，榮祿引兵去撲滅義和團。皇太后命令把檔案搬出去，消滅幫助義和團的一切文件，上諭等；並且把所有的罪，一方面推給義和團，他方面，便推給幾個大臣。



雖然這樣辦，外兵還是入了北京。

讀者很知道，西方耶蘇的代表，是怎樣教訓『黃種蠻人』，他們自謂有『文化的』與『文明的』，而指示給中國人，彷彿是黑暗的中國，是比光明的歐洲落後，可是歐洲列強，無論行什麼和平條約不在他們軍隊未到以前的，他搶掠，比義和團多啦。

他們對待義和團，以及完全和平的，未曾加入變亂的人們，都是像成吉思汗一樣的殘忍；這是不足怪的。要是我們看帝國主義的篇幅，其中有更清楚的，熱烈的，新鮮的流血，可是他們這一次的勝利，以最下流的搶掠著名，因為這個強盜軍隊組織中，各國的官佐都加入的。以有價值的文化，文明的標誌，來作最大的劫掠——這便是文明人的光榮戰爭之特點。

我可以給一個東西來證明這種事實，在資本主義的文明歷史上，是永遠流不去的特點。

在歷史上讀者已經知道收買李鴻章的俄國駐北京的財政的代表鮑何啓諾夫於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七日，曾發出電給彼得堡的財政總長說『全體軍士，約有兩萬。其中四千俄軍，九千日本軍，四千英國軍，還有美國的，法國的。軍隊炸城之後，便佔據了皇宮，現在差不多沒有事了，但

是中國人還非常反對，非常憤恨外兵，因為軍隊壓迫中國人民，搶掠中立的，和平的民衆，並且搶掠得更利害些。其中以日本軍隊爲尤甚，他們自居爲北京的主人翁分配步哨，佔領國庫，雖是其中的錢不多，而日本完全收歸己有。皇太后，皇帝以及滿朝文武，不知道從北京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沙皇得着消息，不只是日本軍隊搶掠，漂亮的俄國軍隊也會做同樣的事情。這個消息得之於1900年十月四日俄陸軍總長枯魯帕提金致俄軍總指揮李烈威支的電中：『英國消息的電報說，我們在北京的軍隊，把宮中所有的軍隊，一律搬出來了，皇帝很生氣的，告訴我這個消息。』

李烈威支將軍回答這個電上說：『宮中的東西，甚麼也沒有搬出來。英國人亂罵俄國軍隊，說搶了宮中，已非一次了，這不過是英國人罵我們的新花樣；我素常尊重同盟者，不肯攻擊英國人，現在我負責說：我親自在英國軍官那裏看見，他們搶的各種新絲貨像山一樣，直堆到天花板那樣高，其他各種絲質的衣服，皮貨，地毯以及各種各樣宮廷的東西，都是像山一樣。每一個英國兵都有裝各樣皮貨東西的箱子；馬上都運到印度；遲了的沒有，不能運到印度的材料東西等，在北京英公使館裏拍賣，一天一天

的，一直賣三星期。拍賣的時候，向各同盟者，都發有廣告這樣拍賣東西，各國及我們的軍官兵士等，都買得有。俄國軍隊，甚麼也沒有得，也不能得。就是我們的兵士抬着銀錠，也是奉命繳出的……………。」

雖是中國是特別的國家，可是無疑的，李烈威支將軍敘述這件事情時在他電文以後說，在中國找着的銀錠數量，後來奉命交出，都是成整蒲特的（每蒲特約值中國三十斤）。

這樣看來，俄國人報告日本人搶，英國人說俄國人搶，俄國人又回答英國人搶，而德國人並不把這放在心上，自己並不隱飾。

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登載了許多兵士的信，信上就說得有搶掠的事。1900年七月二十八日，卡爾李卜克拉西的父親威廉李卜克拉西，在國會裏，有個很長的演說，就是關於空前的德國軍隊發生的搶劫，可是這一次不只是軍官兵士爲自己搶劫，而各政府也一樣的搶掠，譬如德國把北京的天文台儀器都搬走了後，直到一九一九年才還給中國。歐洲各都會的圖書館，都充滿了中國古代的珍籍。博物館裏——有一九〇〇年所搶的宮廷的寶貴東西，及其他的許多有價值的手書及證據等……

義和團運動，結果被消滅于血海中了。而一般所謂戡亂的人，願意搶多少，便可以搶多少。現在中國，應當同資本主義的列強算一算賬，在這當中可利用各帝國主義相互間之衝突的。一般想瓜分中國的希望之所以不能實現也就在此。

因為義和團佔不了使館，北京政府以前相信外人無力，現在也恐怖起來了，纔重一般反對義和團的臣僚袁世凱李鴻章榮祿等，——因為這個緣故，在帝國主義者的方面，一般認為瓜分中國的時間還沒有到的人得了勝利。中國外交界利用帝國主義者的不一致，就在歐洲列強利益衝突上着手了關於此很有趣味的，就是寡居的皇太后，給英女王維多利亞電報，要求停戰，慈禧問女皇的好，並且抱歉的說，現在她國家，已處于戰爭狀況。可是想到商務方面，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是在英國手裏，英國的稅則，是世界上最好的，能助長商業發展。因此，中國各埠，對英的友誼，是永遠存在的。要是這種情形，根本有所變遷，皇太后請維多利亞女皇想一想，假若中國失掉了獨立，那個時候，對於英國的世界情勢便不利了。她直接對英國人指出，保存中國的獨立，是給英王最有利益的。這到很對的，因為英國在揚子江的利益，已經得德國承認了

，已經有了將來的保障，俄國也是不願意再前進（鐵路還沒有修好），去犯大險了。

李鴻章與歐洲的代表開談判，很知道列強間所發生的暗鬥，可是無疑的，這是俄國告訴他的。

有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沙皇不願意英德對中國提出土地的割讓，所以他把衝突的情形，通知李鴻章。李鴻章利用列強的衝突，所以談判的結果，在所訂的辛丑條約中對於中國，還沒有新割地的規定。

按照此次條約，中國應賠款五萬萬兩。這『庚子賠款』以關稅收入担保，這種收入，完全不受政府的管理了，因此，不但經濟的損失，影響于政府的自然，就是政治方面，也有不良的結果。『庚子賠款』一直到現在，都還在繼續交付。後來在有利于美帝國主義的特別條件之下，美國帝國主義放棄了，根據凡爾塞和約，德奧不能不退還了，蘇俄自動的放棄了；而法國英國仍然根據『辛丑條約』收款。

同時殺義和團的領袖，還殺了十三個大臣，有許多充軍，或是賜他自盡。

人道主義，只適用於皇家有關係的人，罪魁——按照歷史上說起來——是端王。可是外交團救了他，大概以

爲這麼大的大人，是不能殺的。

殺幾萬無辜的平民，一定這是不能動他們的心的……  
可是，這次事變的結果是怎樣呢？

義和團運動的重要結果便是完結中日之戰那回事。中日之戰，表現出中國的弱點，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完全把中國的經濟，歸入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手裏去了。滿清政府，還是一個維新的反對者，可是放棄了對外人的爭抗了。這件事的結果，至少在經濟以及工業方面，受帝國主義的侵入了。

還有幾句話，關於義和團事變的根本價值，他有很多的地方，像俄國革命史上有各種現象，如猶太人之屠殺與褚巴妥夫派；沙皇因爲所發生的民衆運動，有反對他的可能，常常用這種方法，想把這種運動，拿到自己手裏。在『人民自由』派的時代，虛無黨人的行爲，把沙皇嚇着了。他就故意造成俄國第一次的大屠殺猶太人的運動，因爲沙皇怕民衆與革命運動聯合了。他設法改變這種運動的方向，就是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也一樣的辦。

在1905年以前，沙皇消弭過俄國的大運動，實際就是這麼樣：工人運動開始的時候，憲兵司令便設法把這運動拿到自己的手裏，褚巴妥夫就作過一次。爲什麼沙皇能夠

這樣辦呢？他不是完全人力造成的，當時人民境况困難，他們的剝削者是地主；可是資本家也是使他們破產的。而鄉村的資本家，就是小猶大商務的代理人，所以農民的反猶運動，風起雲湧，而引起革命。這種運動是反動的，因為打死許多猶太人，而農民的境遇，並不能改良。——可是，實在是農民出來反對剝削者的事實，而是農民革命運動的初步。同樣的，義和團運動，也是中國民衆有革命覺悟的初步，他們覺得要怎樣辦，便怎樣辦。滿洲的貴族，怕這個運動的發生，怕他反過來反對朝廷；所以引導他的方向，只去反對外國人。

俄國的運動，——反猶太運動及裕巴妥夫的運動——都反過來反對沙皇的。我們知道1905年的流血慘劇，在彼得城的組織，是一個受警察幫助的教主作領袖。這個組織的由來，是為使運動歸入一定的方向的，而結果出他意料之外，引起了無產階級的暴動。在中國呢，因為外人參與其間，外國的資本家使運動陷于血海。所以他完全在反動時代，便被消滅了。

這次農民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

浪。

## 十二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之發展，嚴格說起來，實起于鐵道建築以後。當歐洲資本在中國還未實行鐵道政策時，不過是一部分商品（歐洲商品及中國原料）出入于中國而已矣。至於資本主義國際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這時還沒有談到的可能。

我們知道義和團運動及中日戰爭以前已經發生創設鐵道第一次的企圖了。當時英國在東方最大公司如拉金與牧英牛等（現在還存在的上海煙草公司）于1865年試圖建築滬淞鐵道，但恐怕中國政府不許可直接建築鐵道，於是遂用欺騙方法，取得築路租借地；當要求借地的時候，並不說明建築鐵道，還係其他道路。後來，1875年該公司便先開始建築電車道，以後却接用火車頭，而開駛火車了。於是激起中國政府和人民間極大的忿懣，結果迫英國公司出賣此道路由中政府購回這租借區；把鐵道鐵軌及其他材料拆毀，運至台灣，車站也完全搗毀了。這就是第一次建築鐵道試驗的結果。

第二次試驗于八十年代天津開辦煤礦管理局，建築七



英哩長小鐵道以供礦局之使用。此道建設于1881年已開始，其主動者為李鴻章，但李鴻章還未計及一般鐵道的建築，後因運兵之不便，每年在北方或南方建築一點，於是後來便成為京奉之一段。至於鐵道延至北京問題，因恐有傷京城尊威之故致未實現。

因此中國第一條鐵道是中國人自己建築的，在北京雖然也討論過其他鐵道計劃草案，但這些企圖都是很小的。

中國鐵道建築時期之真正開始要算在中日戰爭後，此時為中國政府租借地域的時期，鐵道本身建築僅始于義和團運動之後。假若94—98年代，各為爭奪租界時期，則1900—1911年代便是在中國建築鐵路的時期了。

建築主要鐵道線是那些呢？我們現不敘述建築鐵道年代的發展如何，而是敘述其主要的路線。第一條線的計劃是聯接北京漢口廣東的，其理想為要組織中國北方與南方聯合的路線，以宰割全中國。我們知道，現此線尚未完全實現。

誰係此道的建築者呢？京漢路的北段是1897年出租開始建築的，1905年才建築完成；不過此段必經過開封黃河的三基羅米突長的巨橋，這係這段建築最困難的方面。至于建築資本則主要的為比法所投入。從廣東開始的南方線

，經很長的歷史，至現在尙未實現。這條路線建築應從廣東直接漢口，承租者爲美人，當時美人在遠東尙無多大勢力，各國資本家均起而反抗他之租借。同時便利用義和團暴動結果，鐵路公司債券價格低落由比國國王榮巴爾特（他爲頭等購買債券的騙子），出面指揮購買這鐵路公司債券，但中國政府，在匯豐銀行幫助之下起而反對比國。結果法比手中贖回此租借權。中政府由匯豐銀行借款二千二百萬馬克（等一千萬盧布）來退還此租借區的股份公司，這樣一來承借者還未建築鐵道便得着巨款了。我們知道首先承借者的美國人，發行債券後便賺去大批利潤及到債券價格低落比人便宜買入而高價出賣于中政府，於是大賺其錢，最後中政府借款于英人，而英人又大發其財，總之，這都是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而已。但鐵道始終一點還沒有建築。我們已知道在建築鐵道事業上對於資產階級是何等的賺錢買賣。至於在南方當時則發生大宣傳來主張由本國力量建築鐵道，但是集合來的資本只佔必須費資本之20%。後來中政府于1900年和德國訂約，由德國建築到漢口一段。從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後，除一小段外，至今尙未建築。此外由廣東至九龍一段費去中國大洋一千六百萬元，但全路却落于英人之手。由此可見直貫北京廣東的長條鐵

道線至今未能實現。

第二條線爲山東鐵路，這條鐵道爲德人建築。由膠洲至濟南。此路之意義不但是形式的把山東包圍并且推動礦業的發展。此道建築前黃村煤礦每天出產二百噸，後來增至四百五十噸。此路築成第一年純收二百萬馬克，1907年中運輸百萬人，三萬五千牲畜，及四十萬零九千噸的各種貨物。最初此路爲利潤最多，股息最高的鐵道，德人要與京都直接聯系起見，遂延長山東鐵道至天津北京，因此英德兩國間便引起極激烈爭鬥。根據1900年條約（即著名的揚子江條約）英德資本已把鐵道範圍分配了；德人不應干涉揚子江流域，英人則給德人在山東省的行動的自由。當英德決定聯接北京上海路線時，彼此間遂協定條約如下：德人建築北段，而更長的南段則由英人建築，因此山東省一方既與工商業的中心上海聯接，他方直與北京聯接，經過北京及連滿鐵道。這路的建築所需要的大批資本，皆由英德合資擔任。

至于京漢鐵道，係中國聘用英工程師自己建築的，在中日戰爭後，即當義和團運動時該路爲俄國佔去，經過許多談判仍未爲中政府所有。

建築鐵道的條件在我們分析起來是非常重要的。這些

條件簡直是駭人聽聞的剝削。俄國的著作家卡多洛維赤去年著關於外資與中國鐵道一書中，指明以下的特點：

第一外國資本家根據鐵道條約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為少，——通常如借100元，實收僅90元，利息不按90元計算，却按100元計算；並且每年利息還有担保。此外建築鐵道的資本團取得代購建築鐵道一切材料權，這樣一來，則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益，並且又在購買材料中又賺錢不少。我們知道銀行與外國工廠發生聯繫訂購得商品時，雖然商品價格須取得中國監督官之同意，但銀行家照例稍為賄賂中國官吏後，於是價格便可遠超過于歐洲買入的實價以上了。

第二，鐵路實際上落在外人手裏。雖然中政府經常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般的重要職員如會計及管理工程師等等，均屬於外人；及技術上人員亦多數屬之於外人。

最後，更特別的就是當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歸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在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道的財產來抵債。僅僅是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了付息的方法，用一定的國家的收入（普

通用關稅的收入，因是關稅便歸外人管理了）來担保。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的企圖，原因就是準備遇不能按時付息的時候，鐵路不會變為建築公司的私有財產。

中國同外人最初訂立築路的條約既是這樣，那麼，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看中國資產階級中間很早便開始發生拒絕外債的廣大的宣傳，便毫不奇怪了。反對外債的運動就是聚集資本，發行國內鐵路公債，這樣可使中國政府脫離外資的束縛。於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資產階級自己借款給政府建築了許多各省的鐵路線（例如滬三線）。外國的資本家看見了這種運動，（1911年革命唯一的動力）非常不滿意。在這種情形的時候，外資的利益相符合了，滿清的中央也是不贊成各省的建築鐵路，因為他怕中國在各省有自治的危險。中央政府和外國資本家這時共同的圖謀取消各省的資產階級和省府建築鐵路的可能。

由滿清政府最後的一道命令上就很肯定的說：『朕特此曉諭天下一切鐵路建築須歸政府管理』。在1900年以前整個建築鐵路時期，在各國資本家中間產生了不斷的鬥爭。他們互相毆鬥如黃狗搶奪骨頭一樣。

當反對外債運動開始的時候，政府害怕這種運動，於是在對外借款的條約上也想取得比較優良的條件，在這當

中國際的銀行也明白爲取消他們中間的競爭起見必須開始從事銀行團的組織以壟斷對華借款。因之歐洲由資本主義的大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間便成立一種條約，按這個條約，締約國不幫助任何與銀行團，發生關係，而單獨向政府談判的銀行團體等，是政府在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條件下給銀行團以外的任何團體以租借時。很明顯的，則所有各國一致的聯合的向中國政府壓迫。美國也加入了銀行團。銀行團最主要的發動人和保護者就是在滿洲的美國領事，他知道美國侵入中國較其他的爲晚，別的国家已經有了租界，那麼，他是利於採所有的租借混入一個公共的大渦裏。日本加入銀行團體提出的條件就是滿洲不在銀行團活動之內。南滿洲屬日本——北滿屬俄。這就是所謂特殊的拓殖範圍，但在其餘各地的築路仍須經銀行團的手。不過結果這個銀行團在戰前就瓦解了，美國首先使脫離了銀行團。威爾遜用很感動人的高尚而有道德的宣言聲明退出銀行團的理由，他談銀行團是用以專門剝削不幸的中國的，因此美國不願再參加這個銀行團了。這些都是空話，美國提議過將滿洲的鐵路歸國際公管，觀于這個問題在1909年和1913年中間曾經過很久的談判。其實美國退出銀行團是因爲，第一，他是侵入中國比較晚的，而沒有威望

的國家；第二，美國在銀行團裏面受了很利害的排斥，而戰爭更阻礙了中國鐵路的建築。銀行團什麼鐵路都沒有築成，而中國政府在國民運動高漲的面前不敢照着他們的條件行動。

1920年恢復銀行團的計劃，——雖然重新又有美國的參加也沒有得着實際上的效果。銀行團的組織是以爲期五年，在過去他的期限已滿，但不知道他的期限還延長否？但是，我們知道在銀行團存在的五年中間，什麼鐵路都沒有築成。

這個原因很明顯的，要建築比較大的鐵路必須有比較確定的政治上的條件。外國的資本家不冒着險投入巨量的資本，若是沒有得着政府的承認和有權收回所投的資本可能的保證時。譬如日本和安福系訂立的鐵路借款，實事上就是純粹政治款，安福系公開的爲他政治上的目的將這些借款消費掉後，結果什麼鐵道都沒有建築。

所有這些發展的結果，中國僅有11000 基羅米突長的鐵路線，在這中間更沒有一條實際上聯貫南北和東西的鐵路。所有中國的西部——四川，新疆，同中國內部還沒有鐵路的聯繫。在實際上，所有現在有的鐵路僅僅是作沿海一帶經營運輸的工具，還不能聯貫了全中國。鐵路還不能

成爲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堅強的工具——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鐵路運輸的貨物的統計（自然，還不很正確）。貨物流通以礦山工業品佔第一位。經鐵路運輸的貨物總數16%是——煤，鐵，鹽，而此中更以煤爲最；此外運出的農業出產品佔第二位，而僅佔22%。一個農業國家輸出的農產品只這樣少，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算一部分由水路輸出的貨物，這個百分數還不能說高，還應該注意的就是由滿洲里輸出的大麥，大豆，茶絲，以及一部分在天津轉運的外國的鄉村經濟出產品都算在內，大部分的農村出產品的運輸還是不能經鐵路，而工業品的百分數却又是很低——約10%。

這表示什麼？這就表明大工業的生產品還未能到農民的手裏。雖然，鐵路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因爲鐵路線的稀少還不能使國內經濟完全變更（上面所引的一九二三年的數目字）。建設鐵道的結果除了直接影響到經濟，使經濟加以變動外尚有下面的兩種結果：國債使中國因此加增了人民的賦稅的負擔，而因此農民被迫出賣他們的生產品；有些靠近鐵路的區域和在鐵路影響之下的地方得着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的發展。關於這兩種原因，建設鐵路所發生的結果，在下面我們再爲深切的敘述。



當歐洲的資本家建築了鐵路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念及這將要造成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他們只是那樣想：我們建築了許多鐵路在中國，我們將能藉鐵路來售西歐的工業品，而從中國我們將要榨去許多鄉村經濟的出產品。若是我們讀到當時帝國主義的大煽動的文字，那麼，就可以隨時遇到這種議論。譬如當機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向德國工人們宣傳，不要反對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企圖的時候，他們說，德國的人民在六千萬以上——而德國鄉村經濟不能供養這些人民。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德國向中國輸入工業品而同時藉此利用中國鄉村經濟的生產品，或者是德國把人口移殖到外國去。

他們並沒有計算到中國將因此，自己的工業得到了發展，並且將造成近代的階級，下了革命的種子，而這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不但是飢餓而無領導的農民羣衆，同時却種下了領導農民的工人階級了。

前世紀的學者李赫德高芬在1870年代曾寫道，中國工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可能。俄國的熟知中國的學者瓦西利埃夫，在五十年前就預言中國將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工業國。但是當此帝國主義的爭鬥利害起來和在歐洲的階級鬥爭激烈的時候，那麼，歐洲的資產階級的科學就不會客觀的

安靜的研究中國的問題。資產階級反過來希望在中國建築的鐵路而不使中國人的生活變更；但結果不是這樣，而也不會這樣的。

### 十三

上面我們曾說及關於中國鐵路之建築，這裏我們應該說到按照鐵路條約中國所應付的債券問題。但在先，我們必須把上面所講過的補充一下，和做一翻工夫，而使我們得到一個比較更明顯更具體的材料和概念。

這裏，有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士特拉維的著作，他——士特拉維是一個研究中國鐵路建築的專門家，他說：『在九十年代之末已經有很多研究中國鐵路建築的專門家，在柏林肯定說，在最近十年中，不能想到在中國可以建築鐵路的，因為全中國好像一個大牧場一樣，中國人以為他們祖先的坟墓是神聖的，所以他們絕不想建築經過這些坟墓的鐵路。』除此之外，士特拉維又說，這些專門家更以為在中國有許多的河流，因此需要這麼多大數量的橋梁，鐵路是交付不出的。最後他們肯定說，總之，中國一般人都以為需要鐵路的。這個意思就是說三十年前在柏林的德國資本家方面，那些知道中國的鐵路建築的專門家預斷了十

數年內在中國沒有什麼鐵路的。現在呢，士特拉維說（在1919年所著的書上），中國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經習慣應用鐵路了，鐵路的應用已經很普遍了；尤其是第四等車應用最多，因之成爲鐵路收入最大之一部分。例如滬甯鐵路特別是在旅客們中間得到大宗利潤，（同樣是在第四等車）因爲貨物是從揚子江水道運輸的原故。但是從他這個報告中，最饒興趣的是關於宗教的迷信和敬奉祖先坟墓，究竟有無阻礙了鐵路建設的問題，他說這種宗教迷信只是投機事業的機會罷了。他們組織了許多公司來購買那些路線計劃經過的墳場，然後以高價轉賣給鐵路公司，結果中國人的宗教迷信之不能阻礙事情，猶之乎歐洲資本家，以爲中國有特殊的條件和特別的發展道路的傳說，同樣的無關於實際。

在十九世紀末葉所開始的那些鐵路建築在實際上就是向中國大進攻的一部分表現。

『步步漸進的鐵路戰爭』的著作者美國人奧維拉西說得很對的，他說，『鐵路建築的時期，就是以鐵路和銀行來戰勝中國的時期』。我們明瞭這美國人所給的關於鐵路建築的一般的觀察是很重要的，因爲中國的革命不但是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戰爭呵！現在我們偏提及領事裁判權和租

界等問題，但是以最近革命向前的發展看來，將來的爭鬥首先就要反對壓在中國肩上負擔最重的債券；中國因鐵路而負擔的債券是十五萬萬元，所以很明白的，若果將來做反對這種債券的爭鬥時，外國資本家必定反對而且藉口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們必定說：『好的，俄國人拒絕償還戰時借款，但我們借給你們的錢，是一種好意替你們建築這樣有用的鐵路，所以凡是一切企圖和想減除這種債券的就是直接破壞了最神聖的權利。』在此處，對於我們特別重要的就是，那研究所有鐵道建築歷史的一個資產階級學者，怎麼樣估計那些由借款而完成的鐵路的談判，他在他自己的書上說：『關於外國在中國爭奪監督權問題，表面看來，好像只是那些外交家所進行的政策而已，但是事實上都是國際財政資本的新的投資的鬥爭，那些外國資本投到中國去是希望很大的利潤的，那些國家和財團，所得外交上的幫助，訂立條約的目的，都是使這些銀行和新提加拿到了鐵路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他們借給中國的債務可由政府來維持，所以外人在中國監督權的爭鬥，就是利用鐵路與銀行來征服中國的戰爭。』

資產階級的著作家，都很公開的在他自己的書上肯定的說：『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為幫助中國的，不是為發展

中國的，而是爲着歐洲那些大資本家的銀行，希望利用鐵路來縛束中國的。』『須要謹記的，租界和借款條約，並不是由銀行家私人談到得來的，而是銀行家用本國政府，政治和財政代表的資格和在本國外交幫助之下取得的。』如果讀者做政治爭鬥的時候，現在假說它，將來事情變到嚴重的時候，那末，認識在中國爲鐵路爭鬥的實際歷史，可以給讀者拿到手裏更多的政治武器，因爲必須知道：第一外國資本主義用什麼方法得到沿鐵路的租借地；第二，在什麼條件之下他們取得租借地，和這些條件剝削中國到什麼程度。如果我們看：各國競爭的目的，那末讀者就可以見到，鐵路不止是造成了一個經濟的企業，並且是一個征服中國和瓜分中國的工具。

我曾在上面說過一個條約的歷史，根據這條約，俄國取得連接綏芬河到滿洲里的鐵路建築權，就是橫斷北滿洲的鐵路。（這是1895年的事）並且說及中國在1898年所許允俄國向南建築路綫的條件，把西北利亞的大路綫和旅順口連接起來。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等於俄國奪取滿洲了，而中俄條約在此實起了主要的作用。從此以後，鐵路租借地的狂熱鬥爭也就開始了。但我們如果以爲沙皇政府，以及那些在他背後的銀行界，得了滿洲就滿足了，這是

很錯誤的。沙皇政府當時還有很大的計畫，我現在講由比利時新提加所計畫的京漢鐵路建築草案，讀者知道，比利時雖是富裕，但是很小的國家。那就很明顯了，比利時不是一個主力，而是有人在他後面隱藏着的，這些人就是那些建築中東鐵路和奪取滿洲的角色。在比利時新提加後面，是站着了沙皇政府所幫助的法國和俄國的資本家，沙皇政府所企圖的那些計畫，我們如果想明白他的意義，且去看看地圖就很夠了。在北方全滿洲都在俄國手裏，而京漢鐵路還可以伸張俄國勢力到中國的中部去，如果這條鐵路到了俄國手裏，那麼就可以計畫其他的等等的鐵路了。京津路已經着了眼，京張路也在建設計劃之列，並且想延長到蒙古去。上面指出的這些鐵路，他已經有很明顯的規範了，但是他對於敷設經過土爾其士坦而到開封的路線還沒有定出確實的財政計劃而已。總之，這樣一來，令中國北部，就包括在一個俄國很大的鐵路形式之中了。

但俄國不是單獨行動的，他是和法國資本攜手的。究竟法國資本目的在那裏呢？我們知道法國在中國發展的政策是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以安南到雲南部，而向北延長到和京漢路相接，那麼法國的財政富豪在俄國的撫蓋底下想從北方達到目的地，她也從南方達到了。除此以外，從前

美國取得粵漢鐵路的建築權，後來，事實上當義和團暴動時，却爲與法俄利益有關的比利時新提加轉買來了。

我們看他，怎麼樣從各個斷落的計劃，而竟做出了一個這麼樣大的計劃呢。

我們或者可以說，這是一個幻想，這是須要整萬萬洋錢的大消息的，但是法國那時是一個以金錢供給殖民地的列強之一，法國是一個富農和靠股票利息生活的國家，他們喜歡把金錢放在襪子裏；因爲戰前法國的工業發展很慢，所以他們都樂於投資到外國的借款中來謀發展。不過法國自己是無特別的政治勢力，和特別的軍隊，來保障他在華的侵略的。但是法國是俄國的聯盟者，如果法國有了很多萬萬法郎投在俄國，那麼建築這個鐵路計畫，并不是空想的，因爲她還有俄皇保護她所投中國的資本，很有統治半个中國的可能，如果因爲他沒有實現便認爲是不可能，這是很可笑的一種說法。

但是，其他的國家，對於這個計劃的態度是怎樣呢？對這，法國駐華公使白郎德在一八九八年所印行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得很明白的，在他的報告中并且夾着一個地圖，在這地圖裏，把所有的計劃都畫了出來，這個地圖，是白郎德根據英國在國會印行的正式材料造成的。

我們現在且看，英國和德國在他們自己的利益當中，怎樣破壞了這個法俄的計劃。

我們已經看到俄國用什麼方法取得鐵路的租借地了。在滿洲的租借地，她只用欺騙的手段來取得的。李鴻章受人愚弄了，以為俄國可以保護中國來反對日本的，不過中俄之間，曾經締結過同盟的條約。維德曾說過，庚子之役，李尼維治將軍所帶的那些軍隊，佔據了皇宮，而這個條約才在慈禧太后的房中，一個秘密的櫃子裏找到，並且被他偷了出來了。至於後來的關於滿洲的鐵路條約，都是由一種賄賂手段締結成的，這些行爲，在俄國大臣維德的筆記中，也叫他做奸猾不忠的，但是這個條約也是用『保護中國』的善名掩飾着的。

英國保護他自己的利益，和預備侵略的政策，也是用這個旗號的。普通的說從來沒有一個列強不說，他們所做的都是為着『保護中國』的。外交總長巴爾富爾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三日曾寄一個通告給駐北京英公使麥登尼先生，在這個通告上說：『你總聽北京外交部消息，雖然他不聽我們的勸告，但是我們仍企圖盡可能來保障全中國，因此我們不提出什麼新的疆土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要進行這個政策，以便使中國自動的，首先起來和我們談判，把



那些對於保護香港所必需的土地，讓給我們，是絕對必要的。』

他們不想要什麼新的土地的佔據，但是對於保護香港所必需的土地，就是近海岸的九龍，他們都要求。在那通告上繼續說；『還有，南京必需做個通商口岸，中國必需送給我們幾處鐵路租借區，末了中國必須負責不把廣東或者雲南讓給法國。』

英國向中國要求退讓香港對岸的土地，以為香港的保障，又以為廣東雲南是他的利益的私有範圍，而又恐怕這些省分，沒有得他暗中的同情就給了法國；英國是想要租借地的，但是巴爾富爾自己也不知那些租借地是需要的，然而無論如何，租借地是第一需要的，而且某國如果要『保護』全個中國，那所有這些東西是『絕對必要的』。

當道清銀行站在後台指使的比利士新提加，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的時候，英國新外交總長公爵沙爾巴理知道了，他就宣言說：『這樣性質的租借區不是一種商業的和工業的企業，而是一種在長江流域反對不列顛的利益的政治行動。』

照這樣說來，那麼中國的中部，長江流域，就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不列顛的利益範圍』了。如果沙皇和法

國窺視到那裏，他們不是窺視到中國的心坎，而是窺視到英國的錦囊呵！因此英國政府他通告他自己的代表說：『你必須通知北京外交部，說是如果中國政府對各國再示特殊的讓步與如在滿之於俄，山東之於德以及長江流域之於其他的列強的時候，將來英國政府，就不能夠繼續他和中國的友誼的合作。』

如果中國的將來從事關於債券問題的鬥爭時，——我們已知道中國的關稅，是一個給償債款利息的担保物，——而英國的報紙，將來在那裏大吹其這是友誼的條約的形式，他可以給中國以發展鐵路建築的可能論調時，那麼我們就要回憶到那個公爵沙爾比理宣言說，如果中國政府不担保英國資本，整個的統治揚子江流域時，他對中國的關係，就不繼續他的和平政策的那封文書了。當時中國政府還以為沒有什麼法國俄國的利益站在比利士新提加的後台，但是那些大臣是很知道誰人站在他的後台的，當然，這方法是不能欺騙英國資本的，而英國政府即下命令叫兵艦駛進中國領海了，並且麥登呢他接了個通造——向中國政府說，如果他不屈服於這個問題時，英國就以爲給了比利士新提加那些京漢路的租借地，是自覺的反對英國仇視英國的一個步驟，而他仍將以同樣的方法來對付。同時巴

爾富爾又給英公使以商同在中國領海的英國海軍將官，相機行事的權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便了解英國於一八九八年所取得的那些在揚子江的鐵路建築權，和爲築此路而借款的條約，就是在武力壓迫之下成立的。中國所有的海上老套靴，而不是艦隊，自然不能和英國人打仗，所以當英國的艦隊一在中國的海岸出現時，中國政府就一無能爲了，只有允許英國租借區的要求而已。美國的著作家奧維拉西在他那部『國際銀行團的保護者』裏面很簡單的說到：『總理衙門一見英國的艦隊集中，就完全妥協了。大不列顛就是用這個方法得到他自己的鐵路租借區的』。

英國取得京浦和京漢兩條鐵路，共長有二千八百哩，關於這些租借地的經濟條件，我們下面將要說到。

歐洲列強間，對於這些租借區的鬥爭，爲着中國這塊土地，相互間不斷的鬥爭中，締結很多條約，把勢力範圍，不但和中國劃清界限了，並且自己相互間也劃清了。例如英國應允不侵入滿洲，而當英國銀行以一千六百萬大洋借給中國政府以爲建築（恐京奉路之悞）津浦鐵路時，俄國就出來反對，英國迫得要把這個條約收回，而以俄國應允不侵入揚子江爲交換條件。又如關於津浦的建築，在英德之間，也起過鬥爭的。德人說：『京浦路是經過山東的

，而山東是德亞銀行的祖國，并非上海匯豐銀行的，也非印度銀行的祖國，所以這條鐵路必須由德國資本來建築。』英國迫得要與德國訂定條約，把津浦路的北部，給德國建築，而南部則由英國建築，滬甯路也是由英國資本來建築。

那麼，在這鬥爭所得的結果就是，俄國保存了滿洲了，但是他想從北京向南到漢口，以聯合從南來的法國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從北京向南的鐵路是在英德的手裏，在揚子江流域的路線是在英國手裏，法國建築那條鐵路只到雲南，粵漢路因為相互間不斷鬥爭的原故，很久都沒有建築，而欲以一手包辦，以一條中央大道橫斷中國的，法俄資本的大計劃。因資本主義列強利益衝突的原故，也沒有得實現這個侵略計劃的阻礙力，也就是帝國主義本身利益的競爭。

帝國主義者在這相互間的鬥爭中，自然有了相當的所得：他們得到了放在中國肩上的最煩重條件的負擔，束縛了他將來的發展，所有那些外國銀行團和中國所訂關於鐵路方面的條約，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那些列強實際上得到土地，就以這些土地來保證他的利息，這樣的條約，如德俄所訂的就是了。俄國政府，他取得租借地形式上是為

爲道清銀行的，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什麼，做利息的保障，他簡直不向中國政府要求利息。他的担保就是剝削一切的財富和鐵路兩邊的曠產地，他把管理鐵路的全權拿到手裏。雖然在鐵路管理的有一個是中國人，但很明顯的，這簡直是形式罷了。除此以外，俄國政府還取得保護鐵路的權，他有權以護車隊的形式，來調遣他自己的軍隊。由此看來，俄國的鐵路不但是一個經濟壓迫的工具，並且是直接侵略土地和完全統治當地人民的工具了。同樣的我們看到德國締結條約的關係也是一樣，膠洲路公開的就是德國的鐵路，由德國管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有土地侵略的形式了。

至於英國却換另一個花樣，這原因也很簡單的，要是衰弱的中國，因爲某種事實而訂割讓條約。可是中國政府是不能把中部土地，直接的給旁人的時候，英國的資本主義還不敢有這樣要求，因爲如此在當時就需要偉大的軍力。我們知道英國人作戰，很愛假手他人，所以英國政策的道路，在中國便是這樣：就是不要割中國土地任何部分，而要剝削整個的中國，反使中國政府自己替英國保護租界。關於租界地的英國條約之訂立就是英國的銀行放債，因爲要求保證本利的償還，而從中國政府方面，得一種擔保品

，在最初所訂的條約的担保，要是不能償還債，鐵路就變成銀行的所有物，銀行得的第一種抵押品，就是這條路；也有另一樣的條約——津浦路的建築條約，這裏便把關稅及一部分的監稅作担保品了。事實上，還是英國人管理這條路（總會計——英國人，鹽察員，工程師——英國人及其他等等……），表面上是中國管理，實際上是沒有權。在與俄德訂的條約上，我們看見粗而野蠻的直接侵略的方式，可是這裏呢，手腕便巧妙些了，鐵路名稱是中國的一——要是不能償債，便不是你的了。鐵路管理是中國的，事實上都在英國人手裏。

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時期中所建築的鐵路，自然有一部分，是帝國主義世界的侵略新方法，他一部分，是經濟壓迫的方法並且是一種保障，在中國國際糾紛的時候，可以作政治侵略的先鋒。因此，鐵路便成爲中國發展民族自覺的一個直接原因；中國的資產階級，以及紳士們，很知道鐵路危及國家的獨立，所以關於中國人自辦鐵路問題便成爲一九一一年的一種輿論。

自然很明顯的鐵路之建築可以推動實業的發展，固然當時有專從外國運入鐵路的用品及煤鐵使中國工業無從發展的計劃，不過這是一種烏托邦而已。手工業的煤炭鐵製

製作坊等必隨之恢復起來，因可使鐵路建築價廉多得利潤的原故，僅此一端已可見鐵路推動實業發展之一班了。

## 十四

此地，我們將譚到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歷史和由這個工業所產生的社會上的階級。在我們開始說過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說明的就是中國現代經濟的統計無論是關於什麼問題的統計，沒有那兩個機關所統計的數目字是相同的。例如中國紡織工業共有多少錠，紡織機有多少架，關於這一點各個統計機關每年有不同的數目。若是講到科學的調查統計在這種狀況之下更是談不到。無論是那一部門的生產都不能藉這種統計來得出個大概。因此我們很難在這種模糊的數目表裏面看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中國手工業的影響的大概。關於這一點就是相近的因為可靠的數目都沒有。雖然統計如此的混亂，但是關於工業發展的一般的趨向是可以決定的。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在西歐的作品中間曾屢次講到，但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列強對於他沒有加以什麼考慮。他們看中國的是看做他們自己的原料的來源地和輸出商品的市場。因此若是拿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經濟的

著作來看，那麼他們所寫的中國是一個不能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國家，因為他的落後和停滯。在歐洲當時的文人和學者裏面只有德國地理學家萊荷鈞芬和俄國的瓦西里也夫是一個世界聞名的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在1880年新疆的暴動以後曾這樣寫道：『自從中國完全衰微後不到十年還在北京的滿清政府沒有恢復他所有的土地的統治時候（指新疆，青海）我們且看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些什麼。歐洲人強迫中國所有的沿海的港灣與他們通商，他們侵入到中國的內部到了漢口；但是中國人已經在這個時候就攫取了歐洲的商業。在歐洲人的商店裏面坐的已經是中國的店員。中國人在商業的流轉上並不是外行，他們是在他們生活歷史的開始就作慣了的；——拉撒列在他的書裏面對這種各部的商人也表示了欣賞。這個時期或者不久就要到來，就是中國不需要歐洲的貨物好像他禁止鴉片的輸入一樣，而取之於本國。歐洲商品的輸入中國，是因為機器生產的價廉；但是誰又能否認中國人自己將來建設工廠的可能？在他們有手操百萬的資本家，在他們有廉價的勞動，而人民在準備開始這種事業，並且他們是有能力來經營這種事業。歐洲人在起初以為自己可以用船隻管轄一切的水道，但是中國人却用中國人所造的船隻運輸了麵包到歐洲。這個



廉價的勞動和人民的能幹就是偉大的事業！中國人可以操機器的生產，建築鐵路，一切都比較其他的國家價廉和優良。以前的強迫通商的結果會使這些以前運入中國的貨物，會反過來再從中國運到外國去；既是以前從中國輸出了些紡織原料，而現在這些原料使他們不得不採用了」。自然，在這些瓦西里也夫在1880年所寫的中間已經是很遠的先見。第一個現在的工廠是在1890年成立，就是在35年以前。但是世界資本主義拳匪戰爭勝利以前和鐵路建築以前，工廠的設立僅是從外國傳來的事實，或者只是在港灣的地方，在這裏歐洲的資本家容易得到煤炭和直接的武力幫助和保護。在實際上我們看見工廠的設立就是在港灣的地方也是在中日戰爭以後。最初設立的是英國的紡織工廠。在1895年英國人在上海的紡織工廠達七萬二千錠和七百架紡織機，在1896年工廠的設立就到了九萬六千錠和九百八十架紡織機，基金已達五百萬元。1897年成立上海工廠有四萬五千錠和四百四十六架紡織機，基金一百五十萬元；在1899年成立了——『東洋』工廠，有五萬二千錠。在這個時期共有英國五個工廠，這五個工廠共有三十萬錠，紡織機三千架。近代工業的開始最先就在上海——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到後來英國的資本家創設了第一個資本主義的工

廠，他的原料大部應用中國的棉花，於是開始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

但是資本主義，當他開始了建築鐵路的時候，使他必須建立重工業，他必須在靠近鐵路線的地方尋找煤礦。建立重工業的趨向形成了一般人們對於中國礦產富源過分的誇張。現在我們略為述一述這些傳說。在中國天然富源的估計很多，這些估計都是很難證實的，有的說中國的煤和鐵足供全世界之用，特別多的是鐵；有些說中國蘊蓄地下的煤有德國之百分之七十九，英國之百分之三十三，美國的百分之二十五，蘊蓄尚未開採的礦山有美國蘊蓄的煤礦之四分之一，英國之十分之八，法國和德國之三分之一。但是這些估計並不帶有怎樣的大的意義。中國對於地質學方面的研究非常稀少。就是拿利荷鈎芬的研究（他是唯一的考查，從此才開始了近代對中國的研究），也不過是一種浮面的調查而已，因為不能只用一個地質考查所用的鐵鏈在幾年以內走遍全中國而指明那裏有多少或何質的鐵和煤的蓄藏。在中國沒有那一省經過了科學方法的調查。因此我們也不能用着驕誇以為中國將來能供給全世界的鐵的需要，但也用不着以為中國再經三百年後就沒有了煤。若是真個中國的煤是很少，在一般上講來煤的問題已經沒有

了以前那樣的意義了。

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中間這個問題還成爲一個實際上的問題，並且對中國富源的誇張引起了以前對中國租界積極的爭逐。成羣結隊的外國的冒險隊和資本主義的大區企業的代表都跑到了中國，到處要求發展他們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個爭逐租界區的結果是什麼呢？在高林沙 (Colensä) 所著的書上，可以找着關於這一點很詳細的答覆。這裏，我們只把他很簡單的說一說，因爲這些都是過去的事蹟了。

中國政府在起初很隨便的就准許了外國人考查中國的地質和開發礦山。到最後中國政府才開始恐懼外國資本家這種奴隸中國的行動。說到中國的資產階級，開始就是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國資本家的一段歷史，當法國資本家從北京政府取得了租借權的時候，於是就侵入到雲南和四川，於是便招這些地方的官廳和當地商人積極的反抗，直到地方官廳發出了租界（同時付了外國資本家一些金錢）爲止。

外國資本之伸入重工業不能不直接受北京政府管轄的地方和外國資本家所佔據的地方與直接受外國軍事壓迫的地方以外，即直隸省，山東，山西，和揚子江流域。山

東福順的煤礦，在德人佔據了膠洲以後就完全直接屬於德國勢力威嚇之下，因此在那裏就完全侵入了德國的資本。英國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爭開築煤礦的結果，屈服而與英人締結條約，組織中英混合的新提加。這些可能的原因，就是沿京奉線靠近天津，在這裏外國資本家很容易壓迫中國人。中國資本家用很大的成本所組成的漢冶萍煤礦和所有的地方組合公司所開的煤礦區域的礦山，以及所有的鐵工廠，僅只是因為中國政府推翻滿清政府以後缺乏金錢來維持的原故，就這個公司就入了日本人的統治，經濟的困難強迫他始而同日本人訂約和借貸終則完全降服了。中國煤炭工業和五金工業發展的結果怎樣呢？我們拿幾個數目字來看一看。在1900年煤炭工業產煤共六百萬噸。在1913年世界大戰前，這種工業出產已增至一千三百萬噸。1924年二千三百萬噸。其中一千八百萬噸，是從三十七個煤礦出產的。（世界大戰對這門工業發展的意義以後特別講及）在1900年的煤炭工業不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的大工業，只到1913年才成爲一種大工業，而這種工業在最後的十年中已經增加了兩倍。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太看重了這種發展的意義。二千三百萬噸從中國將來發展的可能觀點看來，這還是一個很小的數目。若是拿美國來看一看，那末在19

80年，就是說在五十年前當美國還沒有成爲工業國家的時候，煤的生產就已經到了六千萬噸了。

現在我們看鐵礦的發展。在一九〇三年根據略爲可靠的數目字，中國鐵的生產約八萬噸，因爲這些鐵都是小礦的生產，特別是在這樣壞的統計之下很難於計算，若是我們拿設立了開灤和福山煤礦，漢冶萍鐵礦後的現代中國工業情形來看，那麼在一九一六年得三十五萬噸礦沙；在一九一八年五十萬噸，在一九二〇年——二百萬噸。礦工已近五十萬。我們再拿這個與美國比較一下。在一八八〇年當美國還沒有成爲工業國的時候，在美國生鐵的採取就已經達到了三百五十萬噸。

當我們講到紡織工業的時候，我們就更看出中國工業發展的微弱。關於紡織工業，我們能有較多的一些材料。紡織工業的發展，開始於一八九〇年。建立第一個工廠的時候，還是在一九〇六年，在這時中國共有十四個紡織工廠，四十萬錠。在一九一〇年中國所有的紡織工業共有八十萬錠。紡織工業的發展，從大戰開始非常之快。在一九一六年共有四十二個工廠，約一百二十萬錠。關於現在中國所有紡織工業的錠數，在一個機關所宣佈的數目是三百萬錠。這個數目就是共有居民一千四百萬的捷克斯拉夫也有

這樣的數量。中國是世界棉花第三位國家，這更證明中國是個原料的國家。雖然中國棉花的質量遠不及美國，但因為運輸到中國的外貨質量的不良，這也不能成為中國紡織工業發展的障礙。

我們站在世界經濟立場上看中國工業的發展實在薄弱，但要與亞洲各國相比較則另有新的意義：1925年日本棉紗工業錠子五百萬個，印度八百萬個，中國三百五十萬個，這足以證明中國在亞洲已發展到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在紡織工業出產中，我們要看他商品流通數量，有以下的事實表現他的變化：據中國統計紡織品輸入在一九一四年占第三位，現變到第七位。國外綿紗輸入量亦相繼的降低，因中國自己產綿紗的緣故。各個工業部分發展情形，我們雖不能一一舉出，僅拿電氣工業來說：歐戰前有電站一三六個，一九二五年已增至四百個，此種統計甚多，足以證明中國工業之發展已開始到各種生產部分了。

我們現在要說明一般的現象，比起數目字當然較有興趣，有以下問題我們要來研究的：

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工業的發展？

中外資本在這工業發展上的作用。

為解釋在中國經濟與政治上佔有指導作用之資產階級

利益起見，回答以上的問題是有特別的意義。

在分析中國工業發展後的社會成分以前，應要說明這根本問題：——

帝國主義者曾否發展中國生產力呢？如盲目的說發展中國生產力帝國主義沒有一點作用，那麼在大戰前外資在中國之建設鐵道，開採礦山等等事實，我們有詭辨理論否認嗎？故帝國主義對促進中國生產力有很大的功用。

促進中國生產力是什麼意義呢？煤鐵係中國所有，帝國主義未運來一點。勞動力他也未創造，百數萬農民自然生成的，現在亦還有數千萬財產的人民，固然，這些勞動力是不是無產階級，因無財產的人民變為無產階級，只有當他被資本主義企業家僱用向創造利潤的時候。

究竟帝國主義之功用是什麼？不是別的，他們打破了中國與世界分隔的壁壘，組織中國的鐵道，使中國與世界經濟聯合及造成世界經濟之影響。外國投資使鄉村過剩勞動力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這工業生產造成資本主義的經濟，這經濟破壞了鄉村中舊式經濟的基礎，因此他在中國是有進步的作用。對帝國主義功用之實際回答，承認他在中國發展上起很大的作用，其意義并非擁護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起進步作用時，剝削民衆，使

民衆破產，貧苦，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方法，除使民衆痛苦外，別無路可走。

現在帝國主義還起進步作用嗎？——這又當別論，要回答他應注意近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命運。如建築鐵道，自1912——13年起來建築一段鐵道，這是不能使中國工業盡量地加速發展，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有鐵道一萬啓羅米特長，據中國經濟利益計算，中國鐵道最低限度有五萬啓羅米特長，爲什麼近來外資不建築鐵路？這種我們要研究外資在中國作用之變化。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時，只願在唯一條件下去發展：——中國在帝國主義剝削下的條件，自從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一一——一三年反抗銀行團與帝國主義訂條件時，事實上財政團體開始在中國停止投資了。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之通牒不啻說道：你或者同意我投資的束縛條件，不然則不發展中國經濟，這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財政團體之政治思想。

至於建設工業呢，自大戰後英人不僅不建設一新紡織工廠，并出售二個工廠於日本，現在還談判出賣別的工廠。法國，美國及德國在最後十年中也沒有建設新工廠。這種原因一半因大戰，使歐資與遠東分隔，一半因戰後政治上之起變化及現在革命之發展，只有日本資本在歐戰中發



狂地建設新工廠，收買舊企業，在紡織工業中佔全資本百分之三十，戰後日本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已是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了。其他的發展也落在中國資產階級手裏，這和資產階級利用戰爭時期及無外國低廉商品競爭的危險，開始建立工廠，並可以高價出售他的商品，因此在帝國主義影響下形成的社會環境使帝國主義很難再束縛中國了。他本欲在中國占壟斷的地位，現在目的不能達到，只有停止參加中國之發展。他不但是停止中國經濟發展之動力，並是障礙中國發展之要素。假使外資甘心退出中國，則中國可用自己財富來發展自己國家。本國資本雖無正確統計，但據中國經濟學家推論，集累在商業上，手工業中，作坊中及農村經濟中的閒散資本不下十數萬萬銀兩，據珍貴金屬輸入無輸出的統計，證明這推論有相當的正確。所以發展中國工業談到資本問題並無十分的困難。

既有資本爲什麼現在排擠外資不若以前的積極呢？理由甚簡單，就是帝國主義不僅不退出中國，並霸佔中國，干涉中國自己的發展。這是怎樣解釋呢？主要的因中國關稅不能自主，這是中國工業發展最大的妨礙。我們知道世界各國之發展，當他工業幼稚時則用保護關稅政策以保護之，不是2—5%的關係，而倚賴工業發展及競爭能力定10

一15%以上的關稅。自然中國在協定關稅之下，工業發展程度如何，一樣沒有保護，結果中國資產階級怕投資於工業而致破產。中國資本初發展時便遭許多倒閉，這是明鑒。并且資本家初經營時，無現代資產階級組織的方法，幼年工程師剛從外國回來，又無其實際經營與知識作指導，所以中國工業還在學習的時期，那能抵制外資呢？

在蘇俄建設工業，倚靠的是資本家豐富的經驗。他們利用資產階級簿記管理等等及他們工程師保留這些經驗，雖然工業品價格昂貴，這是因他們工人農民及城市平民還在學習經驗時代及建築工業經濟還有缺點。這種情形，如何能抵制外資競爭呢？如也採取5%的關稅，不要兩年，他們工業就倒閉了。但他們用對外壟斷商業來保護社會主義之建築，為發展工業起見，必須禁止某種商品進口，允許或禁止必要抽重稅的。中國工業在關稅上毫無一點保護，故帝國主義不但不發展中國工業，并阻礙中國資本之發展。

再取別的事實來說，中外資本在紡織工業上之關係。中國工廠七十三個，錠子2,112,000隻，紡織機13,500架，英國工廠五個，錠子25,0,000隻，紡織機2,863架，日本的工廠41個，錠子1,208,000隻，紡織機6,000架，30%

紡織工業握在日人之手；這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响呢。這種影响就是40%紡織工業的利潤落在日本腰包裏了。這獲得的利潤是否用在發展中國工業上呢？——這是重大的問題，必須加以研究的。

即以採取煤礦工業為例，1920年五千萬美金產量在外人之手，其中日人佔二千七百萬，英人佔二千二百萬，且日本生產煤的40%運到自己國裏，而中國工業上需用煤又從外國運入，所以日本產煤不是為中國的，而是為自己需用。

鋼鐵工業生產與煤礦工業情形一樣的，如漢冶萍鐵礦日本投資的條件是要該礦在長期內有一定數量產額運到日本去，在滿洲礦產有十分之九原料及半製品運至日本。這意義就是日本的資本投在中國重工業上，得着原料是為着自己的工業，而不是為着中國的。所以中國資本家時常至外國購買原料，就是外資用最簡單，最利害的方式剝削中國之影响。日本要保障原料經常之輸入，故在1921年與中國所謂『二十一條』之爭論。這條約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日本政府要求支配中國的重工業；這種要求的目的是為保證與美國戰爭時可盡量利用中國煤鐵，這種煤鐵表面上似乎也是為發展中國工業的。

根據以上分析的結果，證明帝國主義已成為妨礙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了。他的方式有二：

第一，帝國主義拒絕再投資於中國工業中，同時把持關稅為破壞中國工業的工具。

第二，日本的方式投資在中國工業中的，為的取得原料發展他本國的工業。

現在我們得個理論上的結論：中國資本主義首先因帝國主義之影響曾得着發展，帝國主義打穿了中國與世界市場隔絕的壁壘，雖然他的意志殘酷，但還不失其促進中國進步動力的作用。到第二個階段，在帝國主義政策影響之下，產生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及反抗外國資本運動，同時在這運動中參加了廣大的勞働羣衆，及產生了民族革命——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關係已變更了他的政策由促進而變為阻礙中國發展之動力了。

還有一個問題要使我們特別注意的，當資本主義促進現代中國生產力時，他繼續破壞中國舊經濟制度，使農民破產，造成資本主義必要的條件，而革命運動因資本主義發展亦應運而生了。

以後要說到中國商業及銀行為破壞農村之工具，然後就說到土地問題。

## 十五

我們在未說到農業問題之先，必須先考察一下，那些資本主義用來破壞中國農村的間接方法，這些方法，在根本上可別之爲二，一是資本主義的勢力，就是工業品與農民生產，手工業者，與農民的家庭勞動競爭的勢力；第二是增加賦稅，就是以賦稅的方法，來增加對農民的剝削。

我們現在從第二個方法說起，中國的賦稅制度，在資本主義開始的時候，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讀者知道，當中國中央政府與日本戰爭時，只有一個很平常的預算，他每年不過大約是一萬五千萬羅布而已，中央機關從全中國人民中，所得的每年不過一萬五千萬羅布，但實際上的徵稅是很高的。據英國著作家齊樂爾所述，地方官吏所徵收的比之他們所解交中央政府的超過五倍。此外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如莫爾思則以爲官吏所收的比之呈報政府的只大過三倍，但這個究竟是怎麼辦的呢？在一九一七年滿洲政府與地方官吏的協定中，已經是很明顯的確定，某省的督府應解交中央的數目，而他們所應徵收的稅則沒有規定，所以各省督撫總盡量的去收括。

我們現在看看，究竟他們收了些什麼稅。滿洲政府收

入之百分之三十五是地稅，就是農民因土地而納的稅，其次是鹽稅，每個農民買鹽一啓羅就要納一定的稅於政府；第三個收入的來源就是關稅。此外其他的稅比較沒有多大的作用。那末，這樣就是百分之三十五是地稅，百分之三十五是海關稅及通行稅，百分之十是地方關稅，百分之十是鹽稅。

這個賦稅的重担，重不重要呢？這種煩重的賦稅就是促成太平暴動的一個原因。但中日戰爭之後，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起這些稅務更與時俱增。一八九四年中國還沒有什麼外債，外人雖然想用借款方法束縛中國，但中央政府是很怕締結這些外債的；以後當太平革命事起和台灣之後時，中央政府便需要借款了，於是才很急的接收了外債。此後更加上了對日戰爭的賠款，一下子就做成了中國的一個大債務了。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就有了五萬萬羅布債務之多了。庚子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即是七萬萬羅布，要增大了這個債務，所以在1911年中國國家的債務已經超過十萬萬羅布了；但是還不止於此，在1901年帝國主義列強責成中國賠款時，全時要決定，把關稅監督權攫取在自己的手中，以作償還借款的保證。讀者會知道，當太平革命時，海關管理，已經是在外國人之手裏了，但那個時候他們

只是徵收關稅而已，至於整個支配權還歸中國政府管理。在1901年，辛丑條約上，帝國主義的列強，就是這樣說，爲着有長期的交付大利，所有在通商口岸所征收的關稅，須要交給海關總監，（這個總監就是英國魯比爾黑利）和在中國的銀行，由他們轉給本利於列強，這個稅收是等于全中國政府收入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三十五之收入從政府手裏拿出來，轉給到外國資本家之手裏去了，這個便成中國預算上的一個大缺陷；除此而外，中日之戰，庚子之役，日俄之戰，都是明白的告訴中國，如果不組織新式的軍隊，那他將來就有被瓜分的危險，所以滿清已來改編軍隊了。袁世凱那時還是做直隸都督，他奉旨來組織新式軍隊，用新式槍械，聘請外國教練，而這個事業的成功就非有款項不可，可是政府直接收入之百分的三十五又直接交給外人的手裏去了。他方面軍隊的支出又增加。義和團事變後，民族運動，普遍了，擴大了，開學校，和改良管理機關等：都是要增加政府新的支出，於是滿洲政府的錢袋發現了一個漏洞了，預算完全破壞了，滿洲政府之崩潰，也就是因爲預算破壞了，和減少了供給他們的賦稅的源泉之一種結果，

清廷想恢復他的預算，而向外國資本請求給他以財政

的幫助，但外人要求清廷給他們以地稅的管理權。在一九〇四年魯比黑爾利送了一個報單給中國政府，在這報單上說明，如果把地稅概交給外人手裏，那末，以前不過收得一萬萬兩的地稅，將來可以增到四萬萬兩，但國中一般輿論都不准政府這樣做。英公使提議英政府借債，但上海匯豐銀行就預防到南方這樣的嚴重反抗滿洲，恐怕將來，他們不承認這筆款項，所以當時英政府就拒絕了借債。而這個也就是滿洲直接衰落的原因。因為軍隊的餉項沒有發給，於是軍隊開始暴動了，讀者知道的，1911年武昌這些暴動軍隊聯合了起來，接近的佔據了一省又一省，一九一一年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尋找方法來救濟那個預算缺點的問題。所以當買辦資產階級聯合袁世凱戰勝了孫中山，迫他拋棄政權退讓總統位置以後，那時銀行團就批准了袁世凱二萬萬五千萬羅布的借款，這叫做善後借款，也就是為着救濟那個預算的缺點；但是要保證償還借款的本息，外人就取了鹽業專賣，就是鹽業收入。這樣一來，百分之四十五中國的稅收在外人手裏了，而這個數目便不能拿來用在中國內部的支出了：如建築學校，鐵路和組織軍隊等等，這也是清朝既倒之後，而不能組織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



國際資本敢于在中國的衰弱無能的基礎上鞏固起自己的特殊權利，這也就是中國表現了衰弱的結果而已。我們可以證明，在最近幾年來只是好像是一些非常的現象的現象而已。但是如果從英皇的手中拿了他的一半的收入，而這些收入是為維持他的軍隊和官僚機關的，那英國也就好像和中國一樣的衰弱了。中國的衰弱是列強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為什麼自從袁世凱死後直到現在中國還不能組織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呢？如果他們以經濟學的觀點，以組織國家政權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那末，在這裏也不見得有什麼祕密的，國家政權衰弱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國家沒有錢來維持他自己的軍隊，所以這些軍隊必定要自己供給自己，每個中國軍隊軍事首領統轄他自己的兵，依據中國一部份的地盤，來徵收賦稅以供自己私人的需要。

中國政權衰落的近因，就是因為外國的資本家，握住了中國政府的財源，上面已經說過，中央政府，不能使各省官吏解款到京，雖是政府現有的收入比以前徵收得多可是他不能保證一般官僚軍閥督軍等的截留稅收以作本省的需要，而不解到北京。在滿清政府的最後幾年，全年所得的入款，不過七百萬，他全賴在北京以及附近的區域內搜

括，國家的衰弱，就是這種事實的結果，就是中國受了外國巨量的債務的束縛，因為保障這種債務，中國失掉了稅收之半。他方面政權的衰落，還有一種重大的結果，就是有了一半的稅收到了外人手裏，那嗎，所有的軍政長官最少不能不增加本省收入之一倍，以維持省政府；這種軍閥是貪得無厭的，以後便不斷的增加稅收，因為中央政府衰落的時候，各軍區中，便自相衝突起來了，無論如何都說不準張作霖，安福系，直系，吳佩孚等，究竟有許多地方，他們的戰爭起源，便是爭地盤，因為各人都願多佔幾省，多增加他們的收入，因此就竭力擴充軍隊。中國現在有的常備軍，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之多。在滿清時代，中國軍隊並不多，現在中國養這些兵，應當花很大的一筆款項，而這些兵成了鞏固一般軍閥勢力的武器，這便是帝國主義策略的間接的結果。中國國家的衰落，巨量的稅收增加，雖是國權衰落，可是我們知道，最近幾年，因為中國商業流通的發展，而關稅增加，同時，各省軍閥也增稅則，所以旁的稅也提高了。

這種情形對於農村經濟受什麼影響呢？第一個結果，就是地方稅增加，省政府增加地稅，（地丁稅）不特增加以前的普通稅，而且在地方稅上面，增加地方上附加稅，

用種種藉口，以實行取得這種稅。第一個因為他們連年不斷的戰爭，陡然需要許多物質上的供給，第二，他們之中，誰也不知道他們自己能否長久統治某一省，他不被隣省的撲滅，所以他們都是這樣的說『今天生着，今天過，明天怎樣呢？明天再說罷！』究竟農民的稅務增加了多少，沒有任何種統計，可以預算。中國早先是沒有正確的預算的，袁世凱想造一個全國稅收的總冊，可是仍然不可靠的；因為一般督軍，不把他們究竟收了農民多少稅寫出來的，也不預定要徵農民的多少稅，農民也不知道要繳付多少的正確的稅務。可是根據很多的消息，如報章，請願書等等，我們也可以知道中國稅收的增加，農民運動的大多數都是為反對增加稅收，反對這種對農民不人道的剝削而奮鬥，農民除了繳納這種以前沒有過的稅務而外，還有許多旁的損失。以前中國的軍隊不多，現在那些督辦們為增編他們的軍隊起見，完全到農村裏去搜索。以前我曾經說過，就是北京城裏有幾星期沒有過苦力，因為張作霖拿他們去當兵，或到軍隊中去作苦力，在軍閥們的長期戰中，農民不能不常常整年整月的供給這些軍隊的糧食。所以除了很高的稅以外，還要給軍閥白盡許多苦力。

所有這種變化，而農民經濟，受重大的損失，所以農

民破產與貧困，也就是國家政權衰落的結果之一。這種破產是普遍的現象「一般帝國主義的列強是指摘這種破產，而不肯說他自身的罪惡，這便是他們在中國財政政策的結果，使中國國家政權衰落」。可是帝國主義的財政政策的結果——稅增加，還不是國際資本主義的財政政策破壞中國農民經濟的方法。中國國債在1894年以前是沒有的，現在已經到了二十五萬萬羅布，這便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中國農民經濟第一個有力的工具。在世界大戰以前中國沒有軍閥，可是現在成爲破壞中國農民經濟第二個有力工具。第三個工具便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競爭。在那裏表現出來呢？要是讀者在中國手工藝史上用工夫研究，那末，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城市中的手工業大都是製造奢侈品，一般民衆的必需品，都是農民家庭勞働的產品。農民不僅是冬天在家，就是夏天，也在自己的家裏。他有手工業的機器，能生產普通的必需品，如皮件，絲，布棉，茶葉以及種種特別的產品，——都是家庭勞働的生產，作農民收入之大部份。現在這樣的生產品常常受外貨競爭的打擊，爲什麼？這種原因非常簡單：外貨輸入中國，只收入口稅百分二·五，負了各種地方稅，外貨不給釐金，外人在中國內地設的工業，除正稅而外，任何稅也不納。譬如在

上海的外國工廠，只納與地方治安有關係的稅，而國家稅不納，因此，中國農民，無論如何費力，也不能同外國工業品競爭，中國的手工業便完全破產。就是以手工業作附業的農民，也必然費力多，所掙的錢要比以前少。外貨競爭，在經濟方面，影響於農民的生產，其搶掠的程度，也不減于軍閥的重稅。我們知道，這雖然沒有任何統計，可是我們就各種經濟刊物及各時的年鑑中的各種消息，也可以證明各項手工業的破產，除了中國人的特產為外國手工業所不生產者外，這便使農民到這種情形，使他失掉了自己預算冊中的大筆收入，在加稅之外，更使農民羣衆痛苦了。這種結果，自然，很明顯的，農民支付多，而收入大減，造成中國農村經濟的大恐慌，所以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來，中國農村的境況，完全改變了，我們一研究這種農村發生恐慌的環境，就可以明白在農村中怎樣辦，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二十五年來，中國農村完全改變了，為什麼中國農村在現在成為大革命的策源地。

這種事實，影響於土地的分配，使他仍提出土地主權的變換，他們影響于土地的耕種，影響於農民經濟與商業資本家的關係。以後我們把中國農業的統計拿來便可以看見這種農業統計，雖是與中國旁的統計一樣不好，缺點很

多，但是也可以證明所謂——中國沒有階級，中國農民是一樣的有錢，所以中國沒有階級鬥爭——這種觀念完全與事實不合，在地球上，很少這樣的國家，他的農業恐慌鬧得這樣厲利，農業問題這樣重要，成爲經濟與政治的中心，那些國家有中國這樣的情形呢。

## 十六

這裏，我們說到資本主義對中國土地狀況的影響。

在研究土地問題第一個應當回答的問題就是「土地佔有的形式」的問題，就是說中國現在的土地是屬於誰。

土地國有的意思就是說禁止土地的買賣。中國走入了資本主義時期，土地的買賣已是絕對自由的，在中國以及在資本主義時代都是自由買賣土地的基礎上以發展農業。

那一部分人掌握着中國的土地呢？中國的統計關於這一點自然缺少一切科學的根據，但是在這所有的材料中間，也可以推測其大概，吳琳按照一九一七年的統計其主要的數目如下：

我們只選擇幾個必需的數目字來引用。在吳琳的文章裏面把農民分成了四部份：貧農，這部分農民的土地的生產物不足維持他們的生存；次爲小農，中農和大農。每一

部分農民的土地究竟有多少呢？講到這一點，不要忘記一件事實，就是說山東的一畝田不和廣東的一畝田一樣，靠近漢口的不與靠近上海的一樣。一畝田的價值要看他是在靠近海的省分還是遠隔海的省分，要看他是靠近城市還是遠隔城市——因此一畝田因地理的關係有不同的價值。譬如靠近大城市的土地可以種植蔬菜，掌有這土地的農夫可以把菜蔬担到城市裏去賣而獲得高價，這個農夫這樣就可以很好的過去。但是很明顯的就是當我們觀察中國土地的關係的時候，我們要抽象的來觀察，就是不顧中國各省各區的土地不同的價值而是要規定出一個主要的區分來。主要的部分我們區分之如下：

由十畝到二十畝為貧農，由二十畝至四十畝為小農，由四十至七十五畝為中農，由七十五到一百畝為富農——大農。這樣的區分的結果得下列數目：百分之四十九就是說將這所有農民的半數的農民在中國只有二十畝以上的土地。這佔全數農民只靠他自己所享有的土地上無論怎樣都不能維持自己生活的。這佔半數的農民究竟有多少土地呢？在半數農民所有的土地只有二千四百萬畝——佔全土地之百分十五。次為中農——從二十畝到四十畝。我們知道在有些省分四十畝已經不是小農了，但是我們假使拿全中

國一般的數目來看，那麼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這就表示說，四分之三的農民所有的土地等於百分之十一的富農所有的土地。當我們說到土地使用問題的時候，我們從美國和德國的著作中，也可以發見同上面所說的相同的數目字。這些數目字，最先就說到在中國的鄉村存在有富農的等級——佔百分之十一的富農佔有土地之百分之三十五，而並且講到農民中之四分之三都陷於貧困，因此這個數目字就證明了那說中國的社會各階級是平等的，中國的農村中間沒有階級的衝突的論調是毫無根據。這些數目字就已證明說中國的鄉村中間有很激烈的階級衝突。若是我們拿吳琳的調查，和冀特麥爾，與戴羅蘭的著述，以及南京大學的調查來觀察，那麼就可以看出他們所說的數目字有些地方是完全證明吳琳所取的數目字是正確的。在其他關於山東的著述和江蘇的一部分鄉村的調查裏面也都完全證實以上的數目字之不謬。現在我們說到土地使用的問題，不是講誰佔有土地的問題，而是講誰來耕種這些土地和在何種條件之下來耕種的問題。

在我們以上所引用的數目字裏面所講的屬於前兩個部分的農民——貧農和小農——自不能依靠他們自己的土地生存的。他們必須佃種他人的土地，故我們看見百分之



二十八的農民是佃戶。百分之二十八的農民沒有私有的土地，而在別人的土地上耕作的。百分之二十二農民的的土地一部分是私有的，一部分是佃租了來的，僅僅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民是在自己的私有的土地上耕種。這部分的農民怎樣呢？他的社會狀況又怎樣呢？自然在這部分農民中間又有一部分是靠近城市的富農，他有了金錢和工具，而同時佃種土地為取得利潤。這種農民統計起來究竟有多少自然很難斷定，但是基本的農民羣衆還是佃農，這部分農民，他們佃種別人的土地並不是因為取得利潤，而是除此而外別無生路。誰是佃農？誰的土地給人家佃種，和誰來佃種這樣土地？

我們已經講到過中國土地問題的兩個著作。第一個著作是德國的農業專家瓦哥涅爾，在中國山東省曾居留十六年之久和管理農場的事業，他的這本著作大都是講中國鄉村經濟技術的。瓦哥涅爾這本著作每個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人都應當讀到這本書。另外的一種是美人馬洛里的著作，他在中國曾任賑濟會的會長。在這些著作裏面並不是一些煽動的資料和偶然的調查，而是一種應當注意研究的材料。

那麼，誰佃租土地給別人呢，那一部分農民是中國的

地主呢？瓦哥涅爾在他的書裏於中國的地主階級是由以次各種人組成的：第一是滿清的后裔，大官僚，這些大官僚從滿清政府得來土地，他們這些土地自己並不耕種，而是租給別人。瓦哥涅爾講到中國的北部還有這部分的地主存在，並且還有作用，形成了上層的地主階級。第二等的地主階級就是官吏，他們拿剝削農民得來的金錢來購買土地，他們也是自己不來耕種這些土地而是佃租與別人；第三部分就是商人，瓦哥涅爾說這一部分地主有很有趣味的特點，他講這是一種普遍的土地，就是中國的商人和富有的手工業者也企圖在本鄉裏面購買一塊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瓦哥涅爾所推出的這三部分人，他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些材料對我們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他可以決定地主階級的性質。中國地主階級是封建還是商業經濟的地主呢？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來研究，因為對這問題的答案，關係到中國革命許多的根本問題。所有瓦哥涅爾供給的材料中間證明中國的土地講不到封建的領地，而是商業經濟的土地佔優勢，商人佔優勢，這些商人購買土地租給別人，因為從地租中所得到的利息至少要等於百分之十八。瓦哥涅爾所供給的數目中間可以完全證明這點。商人害怕他投到工業上的財產全被軍閥沒收，所以把他的資本投到

土地裏面去，因為他從這中間可以得到很高的租金。農民用什麼形式付地租呢？和怎樣農民陷入附屬地主的狀況呢？對這問題的答覆，也可以供給說明中國土地問題的性質很有趣味的材料。怎麼樣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被迫而佃種他人的土地呢？馬洛里的書裏給這個問題一個答覆。他先計算農民所繳納的稅賦。馬洛里和瓦哥涅爾講到中國農民所納的賦稅比任何國家都高得多。瓦哥涅爾分析山東各地三種農民經濟，各詳細的比較，分析他們的支出，得了以下的結論：農民所付的稅較一八六六年普魯士農民所繳納的稅多至十五倍。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他曾寫以下的數目字：在普魯士國家有很多的土地，農民所交的地租，合地價的35.0%。瓦哥涅爾分析山東的實際農民經濟的情形，說出東省的農民要繳納合地價18.7%的地租。普魯士的農民付國家的租金只有了3.7%，而在中國農民要付18.7%。這個簡單的事實及種種不幸的災難，苦旱等，已經使農民不得不出於借貸一路，並且在這裏我們有許多的材料來表現租金的性質。農民向誰借貸呢？當他陷於貧困狀態的時候。我們現在引用瓦哥涅爾和馬洛里所供給的材料。馬洛里說道：在中國國家付短期借款的利息每年25%，農民中的商人，富農知道農民為清還他的債務必須要付每月30。

5% 借款的利息。小農從什麼地方可以借貨呢？他自然不能到銀行裏去借貨，因為銀行並不經營十元或二十元的借款的。他只有到買他的糧食及其農產品的商人那裏去告貸，或是到當舖裏去典當。對這點在美國的作品裏面特別是注意到的，就是說當舖在世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一種受人尊敬的事業，（當舖的主人是一種小地主），而在中國的當舖受人特別的尊敬，因為沒有當舖，農民便不能夠生存，稱這是一種利於社會的營業。農民付多少利息呢？在城市裏要付的利息，若是各省有災難發生的時候，那麼農民要連當舖也不能去，只好跑到富農和商人那裏去借貨，農民為要生存，常要付到200——300%的利息。

瓦哥涅爾給我們以次的事實，他說，無國家信用機關之設立，因此在最小的市鎮中都有當舖和放高利貸者存在，全中國認當舖主人是很尊貴的，而當舖營業也認為獲利最多的企業。放高利貸在不僅要農民動產品作為抵押，土地也當作抵押品的；並且貸款不得過抵押品價值之半。至於借錢給農民的還有一般商人，他們以農事收成作為抵押，這種借貨是農民最感受痛苦的，往往因債務增加而使自己土地失掉了。據瓦哥涅爾說此種借貨利息每月十分，在世界上所未有的，無論何處，這樣的利息當然會使農民完全

破產，

這樣事實，告訴我們說，受一切災難總合——軍閥壓迫，外國商品競爭，及國家不注意培植森林疏河等發生的飢荒等等——而破產之農民又陷入於商業資本火坑中了。這商業資本是農村經濟破壞之主幹及在農民貧窮化基礎上產生的寄生蟲。中國有些區域（東三省）還存留着封建經濟之殘餘，固然封建地租形式還有，即奴隸地租的形式也還未消滅的。我們知道，還有些農民一無所有，他們不僅租地主土地，並且農具也仰給於地主，於是他們事實上與農奴一樣的，完全成爲地主的附屬。此外，甚至有事實上成爲私有的財產之佃農或奴隸勞動的存在。封建形式雖然存在，但終不能隱蔽現在的事實，這事實是說明利用那些形式剝削農民的階級，不是封建時代的地主，而是產生於資產階級，商人及官僚的地主。當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威尼斯和法羅倫斯商人也利用奴隸勞動的（從近東運來的奴隸），但這種剝削形式無論如何非封建式的，而係資本主義式的。

英國利物浦商人販賣奴隸事業，（從非洲運奴隸至美洲）有百年之久，但不能將他與中世紀利物浦大商與非漸奴隸主相比，因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出售奴隸不過爲

獲得金，裝飾品及美女而已。此地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問題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地主出身於資產階級，而與商人及工業主發生密切關係，他本身或者在工業有股分，同時也投資本於農村中而成爲地主，因此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幫助農民反對他所受的一切苦痛，并資產階級無解放農民之可能。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共同的利益是解放農民及廢除封建主之剝削，爲的是他自己可以獲得商品之購買者。固然在十八世紀之革命中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還有些土地，而法國貴族階級也出賣土地於大資產階級，但巴黎的銀行家需要解放農民，資產階級大部分也不願意農民多付地租於地主。

中國資產階級是利於剝削農民的階級，因此是非封建的而係資本主義寄生階級的性質，結果他反對解放農民的民族革命運動。

以下的問題要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農民物質狀況，即在農民失了大部分土地而這些土地都集中在商業資本家手裏，產生了新地主階級及高利地租率剝削的基礎上所發生的農民境遇問題。有人說，中國地租爲收穫物之50—60—70%時，我們不以爲這是誇大其詞，有名的馬洛里與瓦哥涅爾著作也完全認定這數目是對的。他倆說：地租最低

率爲收穫物之一——50%。近來中國歷史家米來爾在中國民族運動新著作中（米氏懂中文不久曾到過中國與廣東）說他與上海商人談話時，問及上海區農民狀況，他們說這區農民生活很好，地租僅爲收穫物之一半，我以爲50—60—70%的數目爲過甚，但瓦哥涅爾及米來爾也完全承認了，瓦哥涅爾說五分之四之地租在中國也是很普遍的現象，自然這裏還未說及中國農民貧困之現象。

在吳琳及馬洛里著作中，我們可尋找英美作者關於農民預算表之調查情形。吳琳之著作是關於山東整個區域農民預算表的分析，說山東農民不是最貧苦的，至於瓦哥涅爾之結論是：如農民家庭不自用自己家人之勞働而付給這些勞働工資的時候，那麼農民簡直無從經營其事業了。

我們再不要重覆吳琳及美德的研究，我們關於農民預算表一切的數目，我們是很知道的，但這些數目是很重要的，我們因爲有他，使我們能有實際的了解。馬洛里拿此重要的數目來說明：他取英國罪犯每日必需之食品爲例，說在中國有此三分之一的食物即可以養活一個農民了，但中國百分之七十之農民還得不着這三分之一的食物。這是馬洛里從農民預算表中研究出來的結果，我不必將詳細的說，這就這個結論足以使我們明瞭農民生活狀況了。

結論是：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開始組織現代式的工業，促進中國生產力，建築鐵道，開設煤礦，鐵礦及銀行制——在鄉村中則僅做了很大的破壞工作。很明顯的，在農村中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及土地佔有只稍發展而已。這種農業，第一，在東三省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第二，在揚子江流域有農民之上層形式發生。這種開始採用資本主義經濟的農民11%是新式的，是資本主義在農村中之實際建設。在廣大的農民羣衆方面，資本主義帶給他們的只是破產的現象，破壞農民的私有財產，而使他們成爲佃農；即有土地的農民也使其耕種情形不但沒有利益，且其生活較城市中資本主義之奴隸上主要問題更爲困苦。因此，農民問題就是造成中國革命形勢的主要問題，同時又是包括占中國人過半的農民生存條件的問題。這問題只有革命的方式才能夠解決。這問題在中國較俄國還要緊些。中國革命首先是農民的戰爭。上面我們所敘述的是中國主要動力發展狀況與其方向之中心；並分析工業、財政及農村之發展；現在我們分析的主要是我們最有興趣的現代革命運動與其發展，及回答中國發展實際中的問題。

過去的中國經濟發展史的敘述中（從外資侵入時起）



包括以下現象：第一時期——是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用武力開放，中國以義和團事變爲極頂，這時期中國已投降於外國面前。第二個時期——是資本主義之侵入而發生中國社會之變化，這社會變化第一，因現代式資本主義工業之建設，而產生資產階級及工人階級，第二，破壞農村中古式的生活制度，這是中國革命中實際的兩個中心及主要的關鍵。

在下卷要分析義和團暴動後之中國革命運動，孫中山主義的發展，及一九一一年革命之組織，國民黨之產生，和現代中國工農運動之發生。此後，我們研究到最後的問題——中國革命政綱，怎樣建設國家，怎樣建設經濟，怎樣爲工農的革命而提出經濟的政綱及怎樣反對外國的帝國主義——這些問題要常回復到經濟問題的。我想這種分析可給中國一般的及國際的革命者以中國問題一個基本的材料，使每個青年革命者的政治認定不基於願望而基於事實。

##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是法蘭西正統派Marxist, Karl Marx底女婿, E. Engels底弟子, Paul Lafargue繼承Engels『家族, 私有財產, 及國家之起源』而完成的一部世界名著, 在材料上, 在論證上, 都有補足Engels底大著底地方。研究社會學, 經濟學, 歷史學, 社會進化史, 及近代社會思潮, 底人, 都宜人手一編。

##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諾夫著 任白戈譯  
實價一元二角

這是辯證法唯物論者與機械論者五年來論戰之結晶, 露骨地給了機械論者們一個解剖。舉凡一切哲學上最重要的問題如: 哲學底實踐性, 質與量, 還元問題, 物質及其運動, 對立物之統一, 偶然性與必然性, 主觀主義及相對主義……等等, 都有正確而精湛的闡揚。凡是社會科學家, 自然科學家, 哲學家, 文學理論家, 俱有熟讀的必要。

## 思想起源論

拉發格著 劉初鳴譯  
再版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早已取得世界思想上底權威, 就是我國除此書外也有兩個譯本出現過, 只可惜一個是從日文轉譯, 一個是從英文轉譯, 而且是非常零星(只有原書三分之一的光景)的。此則是根據法文原本, 也是最完全的本子, 翻譯的。書的內容在說明抽象思想及善, 義, 靈魂, 信仰, 之起源。另外有論歷史方法及母權父權之變革兩大部份。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 歷史哲學

拉波潘爾著 青銳譯

再版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原名『作為進化科學底歷史哲學』，是當代法國社會科學理論的一本名著。內容在論究：歷史哲學底法則，性質，可能，方法，學說；歷史中底決定因子，個人作用，主觀方法，將支配現在未來底思想之進化及其哲學，等等；尤其闡明了：個人是被動環境中自動的因子，歷史上唯一自動而覺悟的力量。另外，作者譯者底序言，跋語，均很重要。

## 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

再版實價三角

這是當代哲學界權威德波林為說明世界革命最偉大的理論家和行動家底伊里奇底辯證法所作的一部名著，內容非常精確，未附伊里奇所作的『關於辯證法底問題』，尤足為研究此問題最珍貴的文献。譯者有序論伊里奇辯證法底重要性及德波林辯證法著作之地位等。

## 在歷史觀中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弱海時著 青銳譯  
拉發格

實價三角

本書是法國兩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底演講。一個是第二國際底領袖弱海時，一個是馬克思的女婿拉發格。內容在辯論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有文獻上理論上底重要。書末附以譯者底補充，本書遂更加明確而有系統。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 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狄克著 克仁譯

實價八角

中國歷史真可說是黑漆一團，近來雖也有對牠作理論分析的，但少成就。然而世界有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却已作了一個正確的分析。方法很科學。對於各朝代底變革行程，都有優異的新穎的解釋。這是研究歷史，社會史，和政治經濟底人所必買之書。

##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

本書作者是根據關聯于帝國主義的世界的經濟之主要的諸事實，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去檢討(伊里奇序言)而說明其發展之矛盾及其他必然沒落底一部世界名著，實為研究近代經濟學很好的書籍。

##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普列哈羅夫著 青銳譯

實價每册五角 (在再版中)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底鬥爭，從『哲學之貧困』以來便表現得激烈。本書則用新科學的見地來說明牠們的觀點，發展，策略，而判斷其得失，非常公允精當。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1929 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葛喬譯 實價一元

資本論大綱

山川均著 傅烈譯 實價七角

社會主義之路

林哈布著 鄺光洙許平譯 實價四角

新興藝術概論

藏原惟人等著 王集叢譯 實價四角

果爾德短篇傑作選

M. CoId 周起應譯 實價五角

本書所選果爾德底十一個短篇，均是非常精粹的  
品。不僅是完全新的內容，更有與之相適應的新的形  
式。與那些舊皮囊盛新酒或新皮囊裝舊酒底作家們  
實在是迥乎不同的。

二十世紀

每期實價三角五分

特大號每期五角

這是一個純粹理論的雜誌。性質是科學的，批判的，  
綜合的。內容上則是概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  
文學，之一般，及其各部門。所以是一切研究理論者  
們底參攷書或教科書。其第一，二，三，各期均已三  
版；四期已再版；五，六，七各期在再版中；八期初版  
已出。二卷一期在印刷中。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610.01

~~7724~~


5024

5997

拉德克著 克仁譯

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柳井  51/6/6

 ~~64/6/16~~ 70.1.28

~~勃克著~~ 70.10.14 71.2.16.

~~李坤高~~ 71.6.17 72.1.6.

~~76.3.12~~  
76.6. - 6

13A

76.3.12

#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10.01

著者號 <sup>5024</sup>  
7724

登錄號 5997



六

17